

文化会影响我们思考的方式和内容吗？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启动效应^{*}

达夫纳·瓦赛尔曼 (Daphna Qyserman)

李·斯派克 (Spike W. S. Lee)

美国密歇根大学

摘要：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差异会影响个体的价值观、自我概念的内容、关系假设和认知风格吗？一方面，不同国家的研究文献为可预测的系统差异描绘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且连贯的图景；另一方面，该证据的性质尚无定论。跨国研究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文化与行为间是因果关系，且比较的数据也不能具体说明这个影响是应归因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还是仅仅归因于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之一，或者是归因于其他因素（包括文化的其他方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作者对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启动文献进行了元分析及后续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启动对关系和认知方式有中等效应，而对自我概念和价值观的效应则较小。结果的稳定性不受启动方法和因变量测量方法的影响，结果的方向和大小与跨国研究得到的结论一致。这些结果支持情境性文化模型。在这个文化模型中，各个国家间的差异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因为会受到长期的和即时的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影响。对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独特效应，或其他文化因素（如荣誉、权力）的独特效应进行检验则需要等待一些能启动这些因素的更有效的研究。

关键词：文化，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情境认知，启动

在回答什么是文化和文化有多重要这些问题时，文化心理学家既认为之所以生活在不同社会的个体具有不同的经验，是因为文化在其中起着某种程度的作用；也认为文化视角能为心理过程提供新的理解视点（例如：Bond & Leung, in press; Triandis, 1996）。在本文中，我们专注于文化的

^{*} 本文源于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8, Vol. 134, No. 2, 311 – 342。本文已获作者与美国心理学会版权中心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Copyright Center) 免费授权，许可证号：2405940727504。

译者：赵玉芳，西南大学心理学院教授（详见文后简介）。

可操作因素中最显著的一个路径: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 (例如: Hofstede, 1980, 2001; Kağıtçıbaşı, 1997; Kashima, Kashima, & Aldridge, 2001; Oyserman, Coon, & Kimmelmeier, 2002; Triandis, 1995, 2007)。我们使用元分析作为总结工具, 检验那些改变集体主义或个体主义的突出性和易获得性的研究, 以确定其在多大程度上能为文化的重要性提供进一步的见解。我们提出了两个疑问: 第一, 这些研究能否从理论上证明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与核心心理构建 (如价值观、自我概念、关系、认知过程) 存在相关, 第二, 这些研究能否告诉我们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在社会中是如何起作用的。我们做结论的时候也提到, 如果这些研究不能解决上述问题, 那么今后还需要做什么样的研究。

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看,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最基本的不同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个人和社会间的关系是如何建构的; 二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中最基本的单元是个人还是群体 (Oyserman, Coon, & Kimmelmeier, 2002)。在个体主义中, 核心单元是个人, 社会的存在是为了促进个人的幸福, 个体被看作是独立的并作为分析的基本单元。而在集体主义中, 核心单元是群体, 社会存在和个人必须融入群体, 人与人之间通过关系和群体成员身份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间的这些差异是与不同的经验相联系的。在不同的社会内部和不同社会间所选择的认知方式也不同, 个体主义文化更倾向于选择对比或排斥的认知过程, 集体主义文化则更多地选择同化和包含 (如果想获得更宽广的理论过程模型, 请见 Oyserman, Kimmelmeier, & Coon, 2002; Oyserman & Lee, 2007, in press)。

我们之所以研究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 是因为很多研究此主题的文献为心理过程提出了重要的见解 (要了解请见 Oyserman, Coon, & Kimmelmeier, 2002)。我们关注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也因为很多已被确认的文化因素也能够概念上和实证上与诸如权力、女性主义等因素有联系 (要了解请见 Blondel & Inoguchi, 2006)。就像下面所概述的一样, 现存的跨国文献研究既证明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与心理结果 (如价值观、自我概念、认知过程、关系等) 是相互联系的, 也认为文化影响心理结果的内容 (如我们如何看到自己) 和过程 (如图形中的突出形状或关系是否是知觉焦点)。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影响的证据来源于两个渠道: 多国研究和跨国比较研究。

虽然每个研究所涉及的都是独立的样本和测量, 但把多国研究放在一起就共同支持了这样一个观点: 从不同国家中所抽取的公民虽然程度不同但都赞成价值观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相关 (Hofstede, 1980; Inglehart, 1990, 1997, 2000; Inglehart & Baker, 2000; Schwartz, 1990; Schwartz & Bilsky,

1987; Triandis, 1988, 1989, 1995)。作为一种替代大范围多国研究的方法, 跨国研究经常对比两个国家在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特定方面的差异, 或比较一些假定与这些建构相联系的那些变量的差异。虽然每个研究都只涉及了少量跨国比较, 但不同研究的重复, 以及使用不同操作方法对变量的概念性重复, 都增加了结果有效性的信心 (Oyserman, Coon, & Kimmelmeier, 2002)。

对多国和跨国文献的元分析支持这样一个观点, 不同国家在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方面存在系统差异。通过使用不同量表对价值观进行测量, 研究发现北美人与其他国家的人相比, 个体主义倾向更明显, 但集体主义水平较低, 其他讲英语的国家也是如此 (Oyserman, Coon, & Kimmelmeier, 2002)。很多类似的研究也评估了自我概念、与他人的关系、认知风格等方面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是否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有着系统相关。随后对文献进行定量分析发现,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间的不同 (直接测量或者从前述研究中推断), 与自我概念的内容、与他人关系的特征以及认知方式等的确存在系统相关 (Oyserman, Coon, & Kimmelmeier, 2002)。一般说来,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对于关系和认知方式的影响大小处于中等到较大的范围, 而对自我概念和价值观的影响则较小。因此, 这些研究共同验证了先前文献的某些方面, 证明至少文化的两轴——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会显著地、系统地影响心理结果。

这个领域的进展也突出了知识所存在的差异 (gap)。心理学视角最主要的兴趣在于因果推理中加工水平上的差异。Oyserman 和同事 (Oyserman, Coon, & Kimmelmeier, 2002; Oyserman, Kimmelmeier, & Coon, 2002) 发现, 目前的证据只是支持性的, 而非决定性的。也就是说, 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说明国家之间的不同模式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是完全的因果关系, 可能还有其他混淆变量影响这些差异。这些混淆变量可能是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相联系的其他文化变量, 例如荣誉 (如 Nisbett & Cohen, 1996)、权力距离 (如 Hofstede, 1980; 或水平—垂直距离, Triandis & Gelfand, 1998) 等, 也可能是一些非文化因素如国民生产总值 (如 Inglehart & Oyserman, 2004)。而且, 关于国家间差异研究的现有数据还不能解答“什么是文化”这一难题。一方面, 每个社会都有可以标识为集体主义或个体主义的文化 (如美国社会可以标识为个体主义, 中国则为集体主义); 另一方面, 每个社会都可能具有同时包含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 只是在不同情境下所表现出的特征不同而已 (例如, 美国社会通常被定义为个体主义, 但是在某种情境下, 比如国家群体身份突出或者受到威胁时, 就会表现出集体主义; Oyserman, Kimmelmeier, & Coon, 2002)。

一般来说,要获得明确的因果关系,一个办法是在分析模型中控制混淆变量 (Cook & Campbell, 1979)。但是,只有知道存在哪些混淆变量,如何测量这些混淆变量,才能应用这种方法。但是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存在多种可能的混淆变量,了解它们间的相互关系并测量它们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应用这种方法来研究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似乎有问题。因为我们手头上的数据能支持多样性的假设,获得能够更有力地支持因果推断的数据是这个领域的关键所在。

按照实验的逻辑,要证明跨国效应取决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第一步就是操控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并证明当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变得易获得和突出时,国家间的差异会变大;之后就要研究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启动效应,以及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不同方面的启动效应。虽然尚无定论,这仍然有力地证明:跨国研究的差异,根植于作为意义建构概念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显著性和易得性。很明显,通过操控社会结构来操控文化变量是不可能的。

因此,当不能操控自变量 (independent variable of interest) 或系统地控制混淆变量时,就需要加入一个步骤来确认因果关系。这个步骤可以从 Kelley (1955) 的基本模型 (也见于 Taylor & Fiske, 1978) 中得到。这个模型表明:如果变量 A 对结果 O 有因果影响,与个体没注意到 (突出或者获得) A 相比,当个体聚焦于这个变量时其影响更显著。而且,在自然环境中,一些变量 (A 和 B) 不仅两两间存在相关,而且也与结果相联系,这时就可以通过证明 A 对 O 的影响 (当 A 突出时) 来检验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的个体水平效应 (也见于 Schwarz & Brand, 1983; Schwarz & Strack, 1981)。

我们用 Schwarz 和 Strack (1981) 的一个研究来说明进行文化影响研究的逻辑,这个研究关注的是德国社会政策 (政治激进分子不能受雇于公共服务机构) 对政治表达的影响。仅仅在国家政策的框架内,自愿表达政治观点的意愿 (O) 与公共服务 (A) 相关,这并不能充分说明二者存在因果关系,因为一些其他的未知结构因素或个人因素 (B) 可能会影响那些有兴趣来应聘公共服务工作的人。为了表明 A 与 O 之间的关系,就需要操控 A 因素 (而不是其他因素) 的突出性。Schwarz 和 Strack (1981) 假设,存在一组变量能使 A 变得突出,并从中选出一个作为 C 变量,即突出的就业政策。随机分配一半被试到启动条件中,填写一份提及了社会政策的问卷;另一半被试处于非启动条件下,不填写这份问卷。几个小时以后,出现了一个虚假分离事件——被试回到自己的宿舍,并被要求签署一份措辞温和的请愿书,内容是要求政府努力减少空气污染。为了不让被试知道已

有多少人签署了这份请愿书，研究者给每个被试分发了具有单独签名栏的复制本。几乎所有非启动条件下的被试，不管其是否想要这份公务员的工作，都同意签署这份请愿书。然而，在启动条件下，那些想要这份工作的被试则不愿签署这份请愿书。这个实验支持了如下关系假设：在相信自己会受政策影响的被试中，当政策突出（C）时，社会政策（A）与政治活动（O）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正如 Schwarz 和 Strack（1981）指出的那样，该实验并不能证明其他社会结构或个人因素没有参与，因为这些因素可能同时被启动了，但研究确实支持了“政策本身会起作用”这个假说（即使这个作用发生在已存在的混淆变量和其他起作用的因素中）。因为只有当政策被启动时，这个作用才产生，所以该研究支持了这样一个观点：不只是假设的混淆变量 B 有作用，变量 A 也起了作用。这种方法的基本逻辑能应用于文化对心理结果影响的研究中。假设之一就是，可以通过操控社会水平变量、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主观突出性来研究它们的影响；假设之二是，社会水平变量、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三者哪个显著，哪个就会代表与每个心理建构相关的那些潜在变量。研究假设就是，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突出会影响心理建构。

虽然不可能操控社会结构（如学校系统）——假定为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结果，但操控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观念的易得性或显著性则是有可能的。当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比其他因素更突出和更易获得时，更容易影响判断和行为。虽然对突出性的操控并不是关于文化研究的跨国文献的典型部分，但是这些文献显然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情境可以激活文化知识。例如，Liu（1986）的研究发现，中国的教育背景可以使“怎样与他人约会”以及“怎样学习”的程序性知识变得突出。Triandis 和 Trafimow（2001）发现有一系列情境因素可以引发集体主义，这些情境因素包括内群体还是外群体成员、内群体的规模、内群体规范是否得到提示。当提示集体主义时，与个人公众形象相关的自我概念应该变得更突出；而当提示个体主义时，与个人自我评价相关的自我概念方面应该变得更突出。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通过了解个体如何感知日常情境信息来研究文化对个人的影响，应用社会认知研究做工具来揭示文化影响个体的过程就成为可能。社会认知领域已经强调，人类的判断和行为会受判断时即刻涌入脑海的信息以及如何解释这类信息的影响（Bargh, 1984, 2006; Bargh, Bond, Lombardi, & Tota, 1986; Higgins, 1989, 1996; Higgins & Bargh, 1987; Higgins, Rholes, & Jones, 1977; Srull & Wyer, 1978, 1979）。这些突出的和易获得的信息可以是内容、过程或所朝向的目标（Förster,

Liberman, & Friedman, 2007)。内容提供意义; 过程告诉我们如何加工信息以让经验变得有意义 (Schwarz, 2002, 2006); 目标通过表达所希望的结果状态指导我们的行动 (Förster, J. et al., 2007)。内容、过程和目标都可以通过启动技术来激活 (cued)。

在实验室里, 启动技术的实施常常是让被试从事一系列任务, 被试并不能意识到研究者企图影响他们, 不知情的被试通过第一个任务 (启动) 引发内容、过程和目标, 且一直延续到后续的任务中, 研究者可以通过比较不同启动组来研究启动的附加效果。启动试验一般用简单的被试间设计来探讨一个任务 (启动或控制) 如何影响后续的不相关任务 (结果)。

启动激活了某些心理表征, 这些心理表征会在后续的信息加工中充当解释框架的作用 (Bargh & Chartrand, 2000; Higgins, 1996)。当一个概念被启动时, 记忆中其他与之相关的概念也会被激活 (Neely, 1977)。当一种认知方式或思维倾向被启动时, 它也激活了某种思考的方式或某个特定的心理过程 (Bargh & Chartrand, 2000)。思维倾向的启动涉及以前存储的心理过程对后续任务加工的无意识作用。

通过让被试的注意暂时聚焦于与文化相关的内容 (价值观、规范、信仰和态度)、目标和认知方式, 启动研究能在实验室里模拟出现实的社会差异。启动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后, 通过比较不同社会成员的反应差异, 研究者能检验处于不同社会中的成员, 其心理差异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中已被启动的成分。通过操作和启动其他文化因素 (如权力距离), 研究者能检验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和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实验还提供了一种研究的可能性, 即可以验证一个社会里的启动效应是否也会出现在另一个社会里。例如, 如果美国被试和中国被试具有不同水平的个体主义, 在中国启动个体主义是否和在美国不启动个体主义有相似的反应? 或者在美国启动集体主义是否和在中国不启动集体主义有相似的反应?

这种推理路线表明, 个体主义比集体主义更易获得或更突出时, 通过检验判断和行为的差距来研究文化的影响或控制环境是可能的。如果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能够对跨国文献中所描述的自我概念、关系和认知过程产生影响, 那么它们更易获得和更突出时这些影响会更大。因为跨国文献比较了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研究的结果, 进行验证的一个简单而直接的测试方法是, 随机分配一半被试到集体主义突出情境中, 另一半处于个体主义突出的情境中, 之后看看两组的差异是否沿着跨国证据所提出的路线发展。另外一个问题是, 国家间的差异应该归因于集体主义或个体主义, 还是归因于二者。为了检验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将处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

启动条件下的被试与控制条件下的被试进行比较,将单个启动条件(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与控制条件比较,才可以评估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同时启动所得出的结论的稳定性。

在一些新兴的研究中,已经开始了这个挑战,这些研究启动个人和集体自我,检验其在多大程度上会对突出的价值观、自我概念的突出内容、与他人关系的突出方式以及认知风格产生多大程度的可能影响。在本文中,我们报告了对这类文献的系统元分析结果。

假设

从跨国研究的结果中能够得出五个关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效应的假设。为了方便描述,每个假设都包含一个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突出或者易获得性的对比(或与无启动的控制组比较)。当启动个体主义时,①对个体主义价值观的支持会增加,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支持则会减少;②工作自我概念会更强调个人独特的个性,减少对社会或关系认同概念的强调;③对内群体成员的责任、需要和目标的敏感性会降低;④幸福感更多地与快乐、自我实现和个人成功有关,而与履行社会义务和责任联系较少,为内群体成员提供可反射(reflect-able)的荣誉或陶醉于他们的荣誉中;⑤易获得的加工策略更多集中于对比、区分;更少集中于同化、融合或折中妥协。

按照实验的逻辑,在这些范式中启动的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产生的效应会支持这个假设: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影响价值观、自我概念、与他人的关系、幸福感的基石和认知风格。因为这些影响是以实验操控为基础的,因此可以将其解释为是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作用,而非其他混淆因素和相关因素所致。但是研究结果依然不能提供新的视点来解释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与其他文化因素或潜在的混淆变量相比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在不考虑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相对作用时,这些结果可以为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启动的共同影响提供一个总体效应估计。为了评估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相对于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实验设计中所涉及的一些其他因素。因为现在还不能获得这些数据,所以还不能评估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效应,也不能评估其他因素的影响。

通过把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启动分别与控制组比较,就可以知道这些影响到底是由个体主义引起的还是由集体主义引起的,或者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必须要说明的是,与控制组比较是实验设计中的一个常规做法,但是,在研究文化的实验中,因为我们不能推断控制组的被试一定没

有使用与集体主义或个体主义文化相关的概念框架,启动所有被试而不是与控制组比较才可以减少推断的模糊性。因此,将控制组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启动组比较,必须对二者的相对作用做一个保守的估计。因为,一般来讲,应该认为“控制组”被试是受到长期突出的文化建构影响的(如个体主义对于美国人,集体主义对于中国人)。

启动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 一项元分析

方法和样本

对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启动文献的一项早期分析发现,研究使用了很多种启动任务。我们通过 ISI 3.0 电子数据库检索了 2005 年 1 月以来“Web of Knowledge”的英文文献,至少被引用了一次的有关启动的文献包括: Brewer 和 Gardner (1996) 或 Gardner, Gabriel 和 Lee (1999; 拼读循环任务); Trafimow, Triandis 和 Goto (1991; 苏美尔人武士故事; 家人和朋友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任务 [SDFF]); Srull 和 Wyer (1979) 或 Chartrand 和 Bargh (1996; 乱序句子任务)。因为没有找到有关阈下启动或语言启动任务的源文章,于是在 PsychINFO 上做了关键词搜索,也没有发现任何语言启动文献。搜索阈下启动文献的关键词是“阈下”和“文化”或“自我”,语言启动检索的关键词是“语言”和“文化”或“自我”以及“启动”“手段”“代理”“激活”等。我们按照这个方法对参考文献列表上的文章进行检查,如果检索到的文章中引用了一些未发表的研究,我们就向作者求助,这个过程就导致了另外一个研究 (Adaval & Cho, 2006)。我们排除了一些描述特定社会认同(如作为某大学的一名大学生; Gaertner, Sedikides, & Graetz, 1999) 的文章,因为包含任何社会认同启动的研究都会分散对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启动效应的关注。

我们将元分析集中于同时启动了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并评估了二者对价值观、关系、自我概念、幸福感和认知产生影响的 67 个研究(涉及 6240 个被试)。我们在附录 A 中对每个研究都进行了总结,为了提高这个总结的可用性,我们创建了一个嵌套等级层次图。在这个层次图中,根据研究结果来进行总结,在结果层次中根据地区来分类,在地区层次里根据启动任务分类,在启动任务层次中根据作者名字的字母顺序来排列(见附录 A 表 A1 - A5)。其中有 19 个研究在表里出现了不止一次,因为这些研究都不止评估了一个因变量 ($n = 10$), 不止使用了一个启动任务 ($n = 4$),

或不仅仅只包含了一个地区或种族 ($n = 10$)。

在 67 个研究中有 14 个研究 (1664 名被试) 既包含了文化启动, 也包含了对控制组的比较 (Briley & Wyer, 2001, 研究 2; Gardner et al., 1999, 研究 2; Kemmelmeier, 2003, 研究 1 ~ 2; Kühnen, Hannover, & Schubert, 2001, 研究 2 和 4; Lockwood, Dolderman, Sadler, & Gerchak, 2004, 研究 2; Stapel & Koomen, 2001, 研究 1、2、5; Trafimow, Silverman, Fan, & Law, 1997; Trafimow & Smith, 1998; Utz, 2004a, 研究 1; van Baaren, Maddux, Chartrand, de Bouter, & van Knippenberg, 2003, 研究 2)。我们通过这些研究做了一个关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启动相对效应的推断。我们没有把与控制组对比的研究作为一个单独的附录列出, 因为这些研究已经包含在了附录 A 中。

因为一两个原因, 最后一个分析关注了那些并没有包含在主体元分析中的研究 (2986 名被试)。这些研究之所以没有包含在主体元分析中, 要么是因为研究所使用的启动很难解释 ($n = 11$), 要么是因为研究仅使用了一个启动任务 ($n = 21$)。比如, 有两个关注价值观的研究所使用的启动就很难解释 (Bovasso, 1997; Briley & Wyer, 2001, 研究 3), 另外 3 个关注自我概念 (Chen, Chen, & Shaw, 2004, 研究 2; Gaertner et al., 1999, 研究 3; Kanagawa, Cross, & Markus, 2001), 4 个关注与他人的关系 (Wit & Kerr, 2002, 研究 1 ~ 3; Mandel, 2003, 研究 2) 和 2 个关注认知过程 (Briley & Wyer, 2002, 研究 6; Wenzel, 2002, 研究 3) 的研究都是因为难以解释而没有包括在主体元分析中^①。还有 9 个研究仅仅使用了个

① Bovasso (1997) 呈现了一个个体主义启动中貌似社会和个人聚焦的混合物。Briley 和 Wyer (2002, 研究 6) 的研究使用被试自己国家 (认为是集体主义启动) 的文化图标和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化图标; 他们的任务是模糊不清的, 因为其他国家的图标启动的可能是另外的集体主义 (如果这个图标被认为是代表外群体的话)、中性的 (如果图标被认为是完全不相关的), 或者是个体主义 (如果这个图标被认为是代表个体主义)。Chen 等 (2004, 研究 2) 进行了双重启动——让社会身份变得突出, 另外还启动了个体主义或者集体主义。Gaertner 等 (1999, 研究 3) 使用最简群体作为集体主义启动, 这个启动似乎与因变量没有什么相关, 因变量是对侵犯内群体或个人导致的愤怒。Kanagawa 等 (2001) 的做法是让一个教授在一个群组内读 TST 或者通过磁带来呈现教授阅读的 TST, 但是这个操作是如何启动了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还不清楚。

Mandel (2003, 研究 2) 使用不平行的视频包 (家庭男 vs. 简历写作指南) 作为启动任务。Wenzel (2002, 研究 3) 使用最简群体团队 - 聚焦启动 (被试被告知必须与其他人或者团队竞争。在进行竞争前, 要求被试思考并写下自己与其他人的相同和不同之处, 或者思考并写下自己团队与对抗团队的相同和不同)。Wit 和 Kerr (2002, 研究 1 ~ 3) 使用的启动任务是“分配任务”, 被试有时候是单个人, 有时候是在一个群组中或者被群组排斥, 有时候在大群组中有时在小群组中。所有这些任务都非常有趣但是很难根据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启动来界定它们。

体主义启动任务 (Finlay & Trafimow, 1998; Holland, Roeder, vanBaaren, Brandt, & Hannover, 2004, 研究 1; Mussweiler & Bodenhausen, 2002, 研究 3; Stapel & Koomen, 2001, 研究 3 ~ 4; Stapel & Tesser, 2001, 研究 3 ~ 4; Utz, 2004a, 研究 2; van Baaren et al., 2003, 研究 1), 12 个研究仅使用了一个集体主义启动任务 (Brewer & Gardner, 1996, 研究 1 ~ 3; Chen et al., 2004, 研究 1; Crisp, Hewstone, Richards, & Paolini, 2003; Fitzsimons & Kay, 2004, 研究 1 ~ 4; Reed, 2004, 研究 1; Vorauer & Cameron, 2002, 研究 3 和 5), 它们也没有出现在主体元分析中。

我们在作为补充的附录 B 表 B1 ~ B4^① 中总结了上述 32 个研究, 附录 B 使用的编排方法和附录 A 相同。在最终的元分析中使用这些研究的基本原因是为了确定在不同实验设计中我们预设的效应估计的可靠和稳定程度。单独来看, 这个分析中的研究只能作为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效应存在的微弱证据。然而, 如果这些效应在不同设计中都很稳定, 就说明既有研究的发现具有更高的效度。因此, 如果在主要和补充分析中, 研究结果都很稳定, 我们就可以对这些结果抱持更大的信心。

在进行主体元分析的 67 个研究中, 我们排除了 3 个统计资料信息不充足的研究 (Clayton, 2000, 研究 2; Mandel, 2003, 研究 1 的预测; Ybarra & Trafimow, 1998, 研究 3)。除了这 3 个研究, 其他研究的数据虽然有些小小的信息缺失, 但是整体上都是符合要求的; 在发表的报告中, 若一些有用的细节描述不充分, 原文作者可以提供关于研究的设计和统计资料。如果从作者处也不能得到一些数据但可以对数据进行估计的话, 我们借助电脑程序的帮助, 以报告中的描述性统计资料为基础来对效应范围进行估计 (Johnson, 1993)。只要有可能, 我们就根据研究中常用来估算效应的数据来估计标准误。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启动任务 (自变量)

个体主义启动任务集中于个体自我 (如使用“我”作为启动), 或个体自我的一些特定方面 (如个人的独特性), 或者更一般性的差异和区别 (如使用“分离”作为启动)。集体主义启动任务则专注于集体自我 (如使用“我们”作为启动), 或集体自我的特定方面 (如相似性, 对家庭、朋友的义务责任, 大型群体如团队), 或更一般化的联系和整合 (如使用

① 附录 B 内容原刊没有公开刊出, 出于版权和文责考虑, 请需要的读者自行联系原作者: Daphna Oyserman: daphna@umich.edu。——主编注

“联结”作为启动)，这样我们就可以将集体主义启动划分为关系水平、群体水平或两者皆有三类。

群体水平的集体主义

在实验室模拟团队或让被试想象他们是群体的一部分（或单个），如想象他们的家庭（或自己）在享用葡萄汁，用这两种启动任务来启动外显群体水平的集体主义。大体来说，这些启动采用的可能是与经典的社会认同一致的最简群体范式（Tajfel, 1982, 2001; Tajfel & Forgas, 2000; Tajfel & Turner, 2004）。群体聚焦既与 Hofstede（1980）将工作场合作为与文化价值观联结的纽带有关，也与通过在群体中的工作选择来检验集体主义的跨国文献有关（见 Oyserman, Coon, & Kemmelmeier, 2002）。这些都是我们找到的一些最常见的启动任务；但仅有 18% 的研究使用了这些启动任务。

群体模拟。有 3 个研究使用了群体模拟启动范式（Briley & Wyer, 2002, 研究 1~3）。集体主义启动涉及群体构成和群际竞争（五个被试作为一个团队围坐在圆桌边，给团队一个任务名称，告知他们任务是与其他团队竞争，胜利后团队会获得奖励）。个体主义启动是让每个被试坐在由隔板隔开的单人桌前单独完成任务。

群体想象。有 8 个研究使用了这种启动方法（Aaker & Lee, 2001, 研究 2 的预实验和研究 2~4; Lee, Aaker, & Gardner, 2000, 研究 2~5）。集体主义（个体主义）启动任务是想象自己作为网球队的一员，正在和其他团队比赛（单打比赛）；或想象自己的家庭（自己）正在享用葡萄汁。

关系水平的集体主义

有两个启动任务聚焦于关系水平的集体主义，在我们分析的 67 个研究中几乎有一半（46%）都使用了如下两个启动任务中的一种。

家人和朋友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任务（SDFF）。Trafimow 等人（1991, 研究 1）发展了这个任务。个体主义启动的指导语如下：“在接下来的两分钟里，你不需要写任何东西，请思考是什么使得你与家人和朋友不同？你期望自己做什么？”集体主义启动的指导语是“在接下来的两分钟里，你不需要写任何东西，请思考你与家人和朋友的相同点是什么？他们期望你做什么？”正如文中斜体字提示的那样，该启动任务关注的重点是个体与其他人的密切关系。

代词循环任务。Brewer 和 Gardner（1996）发展了这个任务的最初版本，即比较“我们”和“他们”。Gardner 等（1999）改编了这个任务，他们建立了比较关注“我”（以及“我的”）和关注“我们”（以及“我们

的”)的最初版本。其中,“我们”是指几个一起去城市的朋友,特别的是,这个任务是在一个段落中循环使用单数和复数人称代词。下面这个段落是启动所使用的一个材料:

我们经常去城市,当摩天大楼映入我们的眼帘的时候,我们充满期望。我们让自己去探索每个角落。我们看所有的风景,我们去了解商店,我们去任何地方都能看到数百个玻璃窗中我们自己的影像正在背后看着我们。当我们逗留到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在城市的时间几乎花完了。当我们必须离开的最后时刻,我们离开了,因为我们知道很快会再回来,因为这个城市属于我们。

斜体字表现的是关系集体主义启动。在启动个体主义时,段落中的“我们”则会换成“我”,而且故事也会被修改为描述在农场的一天,在海滨的一天,去餐馆和其他事件(见 Haberstroh, Oyserman, Schwarz, Kühnen, & Ji, 2002; Kühnen & Oyserman, 2002; Oyserman, Sorensen, Reber, Sannum, & Chen, 2008)。激活“我”和“我们”应该会激活相关的价值观、描述一个人的方式和与其他人的关系。在这个任务中使用的所有段落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去一个特定的地方。但这个团体必须是小团体,小到可以一起去某个地方。很难想象一个种族、民族、宗教或者国家这么大的团体中的所有成员一起去一个城市,更容易想象得出的是和几个亲密的朋友一起去。

群体和关系水平的集体主义

有三个启动任务聚焦于群体水平和关系水平的集体主义,其中的两个是乱序句子任务(Srull & Wyer, 1979)和闾下启动,它们是启动文献普遍使用的标准范式。在第三个启动任务中,要求被试把自己想象成苏美尔武士,然后根据部落成员身份和家庭出身选择勇士。这个启动任务与 SDFP 很相似,都是通过指导语要求被试想象一个情景。有 36% 的研究使用了这三个启动任务中的一种。

乱序句子任务。在这个任务中,被试需要将无序的单词重新排列以组成一个有意义的句子。为了启动个体主义,会使用诸如我、我的、特别的、不同的、爱竞争的、自己的、自由的、独特的、分离的、决断的、不平常的、自治的、独自的、离开的、匿名的、分开的、不同的、有差异的、特别的、偏离的、独立的、个人的、孤立的、隔离的、孤独的、分开的、独特的、自给自足的等词;为了启动集体主义,则会使用我们、我们

的、加入、相似、分享、合作、同意的、帮助、团队、尊重、同伴关系、一起、团队、支持、他人、被依恋的、同盟、紧密、一致、联结、不可分割的、相依的、亲密的、联合、融合的、交叠的、相似的、共享的、共同、联盟、友谊等词。

阈下启动。就是以非常快的速度来呈现目标词或图片（如 35 ms，确保被试无法进行意识加工）。在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启动文献中仅有一个研究使用了该范式。Oishi 等人（2003，研究 3）在其启动任务中使用了如下单词：我们的、我的、竞争、我、个人、不同、自由（vs. 分享的、合作的、我们、群组、相同、团队）。因为只有一个使用阈下启动的研究，因此我们不得不把它列入“其他启动任务”的分类项目中。

苏美尔勇士的故事。Trafimow 等人（1991，研究 2）发展了这个任务。指导语如下：“我希望你阅读下页的几个段落，当你读完之后，请对主要角色做出一个判断。”之后让被试阅读一个很长的文本，该文本的内容是根据个人天赋、所属部落和家庭出身等不同标准挑选勇士。

语言本身作为启动

有 10 个研究使用语言来启动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Bond & Yang，1982；Kimmelmeier & Cheng，2004；Marian & Kaushanskaya，2004；Ralston，Cunniff & Gustafson，1995；Ross，Xun，& Wilson，2002；Tavassoli，2002；Trafimow et al.，1997；Watkins & Gerong，1999；Watkins & Regmi，2002；Yang & Bond，1980）。双语被试被随机分配在英语组和另一个语言组（例如汉语、宿务语、俄语、尼泊尔语）。研究的假设是，英语及其附带的美国或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知识会唤起个体主义，而其他一些非西方语言附带的关于本土文化的知识则会激发集体主义。

其他各类启动任务

这个类目下包含了 7 个研究，其中一个是阈下启动研究（Oishi et al.，2000，研究 3），因为这 7 个研究所使用的启动任务很难划分到其他类别中。比如，在 Aaker 和 Lee 的研究中（2001，研究 1 的预试和研究 1），被试要观看一个关于个人或家庭方面产品的广告网站。在 Mandel 的研究（2003，预研究和研究 1）中，需要被试回忆一段有益于自己或家庭/朋友的个人购物经历^①。在 Stapel 和 Koomen（2001，研究 2）中，要求被试用一些指定的代词（如我、我自己、我的，或者我们、我们的、我们自己）和形容词（唯一、

① 这条信息仅仅来自研究 1；尽管我们不能从文章或作者那里获得探索性研究的启动任务信息，这个类目中还是包括了探索性研究。

特殊、经常、一起、整合、和谐) 写一段话。Wenzel (2002, 研究 2) 使用了群体形成和 SDF 混合范式。启动集体主义 (个体主义) 的操作是, 让被试坐在一张桌子 (单独桌子) 旁, 以群组 (个人) 为单位玩一个游戏, 共用 (单独) 一张答题表, 并告知被试要与其他组 (个人) 竞争, 给每个组 (个人) 一个名字, 思考并写下自己与其他玩家 (SDF) 的共同性 (差异性)。

结果 (因变量)

为了更好地进行分析, 我们在下面对研究结果进行了分类和总结。和任何元分析一样, 源研究所使用的方法限制了我们对所感兴趣的变量的操作。

价值观

归入价值观的项目包括来自 Schwartz (1992), Triandis (1995), 或 Triandis, McCusker 和 Hui (1990) 的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量表, 中国人社会信仰测量 (如 “如果老师或上级做了一件错事, 他的学生或下属必须容忍他且不能将其透露给任何人”, “现如今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过分宽容了”) 和其他的价值观判断 (如对一些箴言的认可, Briley & Wyer, 2002, 研究 1 和研究 3; 对安乐死的接受, Kemmelmeier, Wieczorkowska, Erb, & Burstein, 2002, 研究 3)。

自我概念

我们将我是谁 20 题自我陈述测验 (TST, 一种开放式自我概念测量工具, Kuhn & McPartland, 1954) 和它的变体——Leung 和 Kim (1997) 及 Singelis (1994) 自我构建量表中的一些类目划分入自我概念一类。TST 研究提供如下内容编码: 关注个人的自我概念 (如特质、能力、身体表征、态度); 关注关系 (如在朋友或恋人关系中的角色) 或集体的自我概念 (如社会群体、民族、宗教群体成员)。

关系

我们认为四个变量与关系相关: 社会责任, 感知到的来自他人的社会支持, 社会敏感性和亲社会倾向。这一类目也包括一些更具体的操作, 例如是否愿意选择靠近目标人物的座位等。

幸福感

我们把心情 (Gardner, Gabriel, & Hochschild, 2002, 研究 2; Ross et al., 2002)、情绪状态 (Lee et al., 2000, 研究 5) 和生活满意度 (Oishi et al., 2000, 研究 3) 划入幸福感这一类。

认知

不管是在社会判断任务、社会比较任务, 还是在非社会判断背景中对

加工过程的测量（如接纳－排斥，同化－对比，联结－分离和抑制－促进）都属于认知类别。

数据库的其他特征

语言

不包括将英语、德语、荷兰语和汉语作为启动的那些研究。

地区和国家

涉及了三个地区共七个国家和一座城市：北美（美国， $n = 36$ ；加拿大， $n = 2$ ），东南亚（中国香港， $n = 18$ ；尼泊尔， $n = 1$ ；菲律宾， $n = 1$ ；新加坡， $n = 1$ ）和西欧（德国， $n = 9$ ；荷兰， $n = 6$ ）。

种族/族裔

有三个美国研究（Gardner, Gabriel, & Dean, 2004; Oishi et al., 2000, 研究3; Trafimow et al., 1991, 研究1）清楚地注明了被试是欧洲人和一些其他族裔（主要是亚洲人），而且也分析了族群差异。然而，更多研究并没有提供明确的被试种族信息。如果研究中不包含少数民族的被试，或只是包含了极小的少数民族样本，那么对小样本群组进行分析是不妥的。除非另有说明，我们一般认为所选取的被试都是该国家的主要族群（如德国的德国人）。

由于这些限制，我们将种族分为三组：欧洲人和欧裔（德国人、荷兰人、盎格鲁－撒克逊，或具有欧洲血统的北美人）；住在北美的亚裔^①；住在亚洲的亚洲人（香港人、新加坡人、尼泊尔人、菲律宾人等）。这个分类仅排除了两个研究，我们在随后的分析中将这此比较称为“按地区分类比较”。

性别

仅有三分之一（37%）的研究在统计分析时包含了性别变量；如果分析中没有包含性别，就完全忽略对被试性别信息的描述。一种可能是，在研究中没有平衡性别，也可能仅仅把性别当作启动效应不会出现后再进行分析的一个候补变量。

学生作为被试

除了五个研究之外，其他研究的被试都是大学生，虽然这些研究并不

① 我们把 Ralston 等（1995）中的美籍华人编入亚裔美国人组内，因为这个组指的是充分体验过亚洲文化的人，突出的是在美国出生但有亚洲家庭背景的人。

同质。其中有三个研究是同时选用大学生和其他群体做被试,且报告了整合后的结果(Marian & Kaushanskaya, 2004, 本科生和研究生; Trafimow et al., 1997, 本科生和高中生; Trafimow & Smith, 1998, 本科生和成人),只有两个研究的被试不是大学生(Kemmelmeier & Cheng, 2004, 中学生; Ralston et al., 1995, 经理)。

现有数据的局限性

就像心理学的研究通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被试基本上都是大学生,这样样本的信息就是有限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被试的性别信息甚至经常被忽略。这与对文化进行跨国研究的文献类似——并非所有国家的代表性都相同。在当前进行元分析的67个研究中,有36个研究是在美国做的,44个是在英语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香港)做的,不在英语国家做的研究有德国9个、荷兰5个和中国香港1个。有10个研究使用语言本身作为启动。大多数启动研究只涉及一个国家。不过,有8个研究或直接比较了一个国家内的启动效应与跨国启动效应,或比较了两个国家间的启动效应(Aaker & Lee, 2001, 研究2 预试部分和研究2; Briley & Wyer, 2001, 研究4; Gardner et al., 1999, 研究2; Lee et al., 2000, 研究3~5)。这些研究的结果与仅涉及一个国家的启动效应研究结果一致,这为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启动效应的有效性提供了支持。

对效应的计算和分析

效应的方向和大小

为了方便解释,我们将支持假设的效应命名为正效应,将不支持假设的效应命名为负效应。按照Cohen(1988)的解释方法,当 $d < 0.4$ 的时候,效应算是小的;当 $0.4 < d < 0.7$ 时,效应算是中等;当 $d > 0.7$ 时,效应算是大的。

计算效应

我们用Rosenthal(1995)的CMA2.0(一种整合元分析工具)(Biostat, 2005)计算和分析启动效应的加权平均数。我们的兴趣是检验特殊启动中的效应(而不是所有可能启动中的一个代表性效应),因此我们使用的是固定效应模型。

加权平均效应就是,由合并标准差(g 分析)和 g 方差(变异)的倒数来划分的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启动条件产生的平均数差。这个方法对可靠的效应量给予了更多的权重(其特征是变异更小; Hedges & Olkin,

1985; Johnson & Eagly, 2000; Lipsey & Wilson, 2001), CMA2.0 (Biostat, 2005) 将 g 转换为 d , 计算了 369 个效应量。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325 个效应量或总体的 88%) 是以平均数、标准差、栅格大小 (cell size) 为基础来计算的。在余下的 12% 效应中, 有 28 个是通过平均数、栅格大小 (cell size)、 F 值、 t 值或 Z 分数计算的; 8 个是通过卡方值和样本量计算的; 4 个是通过比率和样本量计算的; 3 个是用平均数、标准差、样本量和被试内变量的相关计算的; 还有 1 个是用样本量和 p 值计算的。

作为一个保守的估计, 为了不违反独立性假设, 我们首先计算了每个研究的平均启动效应。由于这些研究有多个因变量、多种启动方式或多样的被试群体, 因此整体研究 (单个研究) 的效应量是每个研究效应量的加权平均数, 标准误是与其相关的标准误。

如果作者们列出了充足的统计信息, 即使他们报告没有效应或效应不显著, 我们依然计算了其效应量; 除此之外, 我们还使用了最保守的估计和指定 $d = 0.00$, 单尾 $p = 0.05$, $Z = 0.00$ 来估计 (Rosenthal, 1995)。

计算同质性系数

我们计算了两个 Q 同质性统计值: 组内 Q 和组间 Q 。组内 Q 同质性系数用来评估的是样本对总体的推断程度, 即我们用来分析的这些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启动研究样本是否可以用来推断总体。如果组内 Q 系数不显著, 那么就可以进行从样本到总体的推论; 如果显著, 这种推论就不可靠。组间 Q 同质性系数用来评估族群间的效应 (不同启动任务) 是同质还是异质。如组间 Q 系数显著, 就说明是异质的, 那么随后我们就使用中介分析来明确地找出异质源。

调节效应分析

因为启动研究为复杂的自然环境提供了一个简化的类比物, 因此, 评估混淆变量 (如干扰变量、样本特征) 是否显著的调节启动效应就非常重要。把干扰因素看成是多重研究内的效应就可以用 CMA2.0 (Biostat, 2005) 计算中介效应。例如, 为了计算性别效应, 我们分别收集各个研究中男性和女性的数据并合并为以性别分类的两个独立研究, 之后分别计算男性被试和女性被试的文化启动效应。鉴于没必要单独计算研究内的效应, 所以这个方法不会影响效应量估计的精确性, 但有可能会增大标准误。因此, 应谨慎看待比较各调节变量不同水平的统计显著性 (Biostat, 2005)。

元分析结果

主效应

我们发现启动对价值观、自我概念、关系、幸福感和认知风格有影响。就像表 1 所总结的那样,整体启动效应(不加权的效应平均数 $d = 0.45$,加权的平均数 $d = 0.34$,标准差 $SD = 0.34$,标准误 $SE = 0.02$,95% 的置信区间 $[CI] = 0.29, 0.39$)与假设的虚无效应($d = 0.00$)差异显著($Z = 12.90, p < 0.001$)。表 2 中的茎叶图展现了效应大小的范围,从该图可以看出大多数启动效应集中于小到中等($0.3 \sim 0.6$)的范围。敏感性分析表明效应是稳定的;我们用 Rosenthal (1979), Duval 和 Tweedie (2000a, 2000b) 的方法, Rosenthal 的 fail-safe N 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为了使观测的启动主效应显著,必须找到另外 3495 个虚无效应研究。并不需要知道多少个研究才能产生虚无效应的结果,因此 Duval 和 Tweedie (2000a, 2000b) 设计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假定效应之所以呈不对称分布是由于发表偏倚(publication bias)所致,而非其他因素(如多种研究的质量,不同的结果测量方法,缺少不显著结果的效应量等)造成的,通过估算和填充数据精炼了计算过程,并创造了一个对称的效应大小分布图,且得到了一个对效应大小的保守估计(见 Sutton, Song, Gilbody, & Abrams, 2000)。使用这种方法,我们创造了漏斗图,其中包括 24 个“缺失”的研究(见图 1)。即使使用这个保守的方法,调整后的效应仍然显著(加权平均数 $d = 0.17$, $CI = 0.12, 0.21$)。

当剔除了三个不合格的研究后,效应大小有轻微的变化(见表 1 第二列),整体启动效应为中等(不加权效应平均数 $d = 0.49$,加权平均数 $d = 0.42$ 标准差 $SD = 0.42$ 标准误 $SE = 0.03$ 95% 的置信区间 $[CI] = 0.37, 0.48$, $Z = 15.13, p < 0.001$)^①。虽然我们假定剔除这些研究后,所计算的效应值会更准确,实际上,不管数据库中包不包含这 3 个研究,都不会对整体效应产生影响。为了提供保守的估计,我们在进一步的分析中使用了所

① 异常的研究包括:测量了情感的一个研究(Lee et al., 2000, 研究 5),当香港依然是英国殖民地时做的两个研究(Bond & Yang, 1982; Yang & Bond, 1980),这两个研究都是使用语言作为启动,且用外国人来评估被试的价值观(因此英语似乎与殖民权力有关)。涉及情感的研究没有提供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启动的主效应信息,只关注了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启动与自我调节中的提升和抑制的交互作用。

有可用的研究，然后又重新检验了包含这 3 个研究和不包含这 3 个研究的效应大小。

表 1 启动效应：元分析结果概要

标准	全部研究	剔除异常的 研究项
集中趋势		
独立研究总数	67	64
独立受试者总数	6240	5408
每项研究受试者的中位数	63	62
未加权 d 值均数	0.45	0.49
效应值中位数	0.43	0.47
加权 d 值均数 (d_+)	0.34	0.42
验证假设的研究总数 (%)	57 (85%)	57 (89%)
离散趋势		
标准差 SD	0.34	0.42
d 最大值	1.43	1.43
Q_3 : d 值第三四分位数	0.69	0.69
Q_2 : d 值第二四分位数	0.43	0.47
Q_1 : d 值第一四分位数	0.22	0.28
d 最小值	-0.42	-0.27
Normal-based $SD = 0.75 (Q_3 - Q_1)$	0.35	0.31
显著性与同质性检验		
合并 (Stouffer) Z 值	12.90***	15.13***
加权 d 值的 95% CI	0.29, 0.39	0.37, 0.48
标准误 SE	0.02	0.03
同质性系数 Q (合并加权 d 值与未加权 d 值)	256.57***	174.54***
解释数据		
稳健性系数: M/SD	1.32	1.17
失安全系数 (Classic fail-safe)	3495	3954

注：异常的研究是 Bond 和 Yang (1982)，Lee 等 (2000，研究 5)，Yang 和 Bond (1980)。排除它们的理由在文中已有说明。如果效应与假设的方向一致，就被认为是正效应；反之就是负效应。效应值是通过变异的倒数来衡量的。 d = 效应值； d_+ = 效应值的平均权重； Q = 效应的同质性系数；CI = 置信区间。*** $p < 0.001$ 。

表 2 67 项研究中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启动效应 (d):
茎叶图 (Stem and Leaf Displ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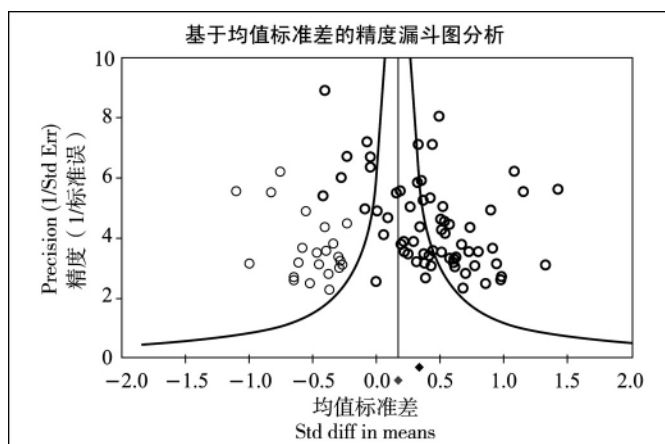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图 1 基于均值标准差的精度漏斗图分析

每个研究的标准误的倒数和效应值 (d) 的关系, 包括或者不包括补充分析中加上的 24 个研究。Std Err = 标准误, Std diff = 标准差, 黑圈是元分析中包括的那些研究; 灰圈是后来添加的研究。黑方块是元分析中所有研究的平均数的整体标准误; 灰方块是补充的研究的平均数的整体标准误。

调节效应

启动任务和集体主义启动水平

我们首先检验了到底是特定的启动任务还是任务中集体主义的启动水平调节了启动效应。我们发现不同启动任务的效应差异显著（整体 $Q_B = 47.48, p < 0.001$ ），其中使用语言作为启动任务时，效应是最弱的。最常用的两个启动任务是 SDFP（ $d = 0.49$ ）和苏美尔勇士任务（ $d = 0.45$ ，都

来自 Trafimow et al. , 1991) , 启动效应中等且同质。正如表 3 所详细呈现的那样, 在第一组中, 除了上述提到的两个启动任务, 其余启动任务不是效应值很小就是效应不同质。

在集体主义启动的水平上, 既能启动群体水平集体主义又能启动关系水平集体主义的是苏美尔勇士、阌下启动和乱序句子这三种启动任务。当使用这三种启动任务时, 相较于仅启动了一个水平的集体主义(群体水平: $d = 0.28$, $n = 11$; 关系水平: $d = 0.39$, $n = 0.28$) , 其效应更大 ($d = 0.52$, $n = 22$; 组间同质性系数 $Q_B = 9.61$, $p < 0.01$ 显著) , 详见表 3。

表 3 启动效应作为启动功能(任务与集体主义启动水平)和因变量(类别与操作)

变量	Q_B	d_+	95% CI	Q_{wi}
启动的调节效应 ^a				
启动任务(n)	47.48 ^{***}			
代词循环(15)		0.34	0.23 0.46	54.26 ^{***}
SDFF(10)		0.49	0.31 0.67	3.25
苏美尔勇士(12)		0.45	0.30 0.61	13.34
乱序句子(7)		0.32	0.14 0.51	8.45
群体模拟(3)		0.34	0.04 0.64	2.98
群体想象(8)		0.28	0.16 0.39	63.55 ^{***}
语言启动 ^b (10)		0.10	-0.02 0.21	41.13 ^{***}
未分类启动(7)		0.78	0.60 0.96	26.20 ^{***}
集体主义启动水平(n)	9.61 ^{**}			
群体水平(11)		0.28	0.18 0.39	66.69 ^{***}
关系水平(28)		0.39	0.30 0.49	60.14 ^{***}
关系水平与群体水平(22)		0.52	0.41 0.63	59.32 ^{***}
因变量的调节效应				
结果(n)	66.30 ^{***}			
关系水平(13)		0.61	0.47 0.76	18.16
价值观(15)		0.29	0.19 0.40	61.88 ^{***}
自我概念(21)		0.26	0.17 0.34	49.57 ^{***}
幸福感(4)		-0.13	-0.30 0.05	16.17 ^{***}
认知(28)		0.54	0.46 0.63	88.87 ^{***}
操作				
价值观(n)	1.79			
个体主义 - 集体主义(6)		0.40	0.21 0.59	8.18
其他价值(9)		0.25	0.12 0.37	51.91 ^{***}
自我概念测量(n)	0.97			
TST(24)		0.23	0.09 0.26	38.73 ^{***}
Non-TST(19)		0.18	0.15 0.32	131.87 ^{***}

续表

变量	Q_B	d_+	95% CI	Q_{wi}
自我概念内容(全部研究) (n)	15.91**			
私我(18)		0.19	0.10 0.28	41.08***
关系自我(5)		-0.03	-0.21 0.15	59.44***
集体自我(12)		0.36	0.25 0.47	23.86***
关系与集体自我(8)		0.12	0.02 0.27	31.29***
自我概念内容(TST研究) (n)	26.15***			
私我(9)		0.31	0.17 0.44	30.12***
关系自我(3)		-0.20	-0.41 0.01	50.09***
集体自我(8)		0.24	0.11 0.38	15.36*
关系与集体自我(4)		0.67	0.38 0.95	10.16*
认知(n)	0.91			
社会态度/判断(10)		0.50	0.36 0.65	20.41*
社会比较(10)		0.59	0.46 0.73	64.71***
非社会判断(8)		0.52	0.34 0.69	2.84

注: Q_B = 组间同质性系数; d = 效应的平均权重; CI = 置信区间; Q_{wi} = 组内同质性系数; SDF = 与家人和朋友相同或相异任务; TST = 我是谁 20 题自我陈述测验。

a 当提升聚焦和个体主义文化启动匹配的时候, $d = 0.42$ (95% CI = 0.26, 0.59; $Q = 16.96$, $p < 0.05$); 当抑制聚焦与集体主义启动匹配时, $d = 0.51$ (95% CI = 0.34, 0.68; $Q = 12.10$, $p < 0.01$)。

b 语言启动效应 $d = 0.23$ ($Z = 3.42$, $p < 0.001$; $Q = 24.74$, $p < 0.001$), 忽略了 Bond 和 Yang (1982), 以及 Yang 和 Bond (1980) 的研究, 因为这两个研究的结果也许只适用于英语作为殖民地语言的情况。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因变量及其操作

对于因变量, 关系 ($d = 0.61$) 和认知 ($d = 0.54$) 两个因素上的启动效应符合假设方向且效应中等。自我概念 ($d = 0.26$) 和价值观 ($d = 0.29$) 的效应虽然也符合我们假设的方向, 但效应很小。对幸福感的启动效应还没有清晰的证据。但幸福感上的整体效应是负的且接近零 ($d = -0.13$), 主要是因为包含了一个 $d = -0.39$ 的研究 (Lee et al., 2000, 研究 5), 我们在主效应分析中剔除了这个研究。当剔除这个研究后, 对幸福感的效应从 -0.13 上升到了 0.32 , 虽然效应值很小, 但与假设方向是一致的 (详见表 3, 第三列)。

我们想知道效应的异质性是否是由具体启动任务和结果 (是否特定的任务对于特定的结果更有效) 的交互作用引起的。图 2 呈现了常见的启动任务所对应的效应量。表 4 是详细的结果。表 4 的第一组列出了使用最广泛的启动任务 (代词循环、苏美尔勇士、SDF 和乱序句子); 第二组呈现的是用语言作为启动任务的效应。虽然语言相对而言是使用较普遍的启动项目, 但就

像我们曾提到的那样，语言启动的到底是什么并不明确。在第三组中，我们呈现了一些不太常用的启动任务。这些启动主要是单个实验室团体（群体想象、群体模拟）使用或排斥的任务，还有一些不能分类的启动任务也包含在最后一组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启动任务都有效应。代词循环任务所引起的效应较小，可能是因为用这个任务研究的是自我概念。同样，SDF 启动任务启动效应很强，可能是因为这个任务是用来研究关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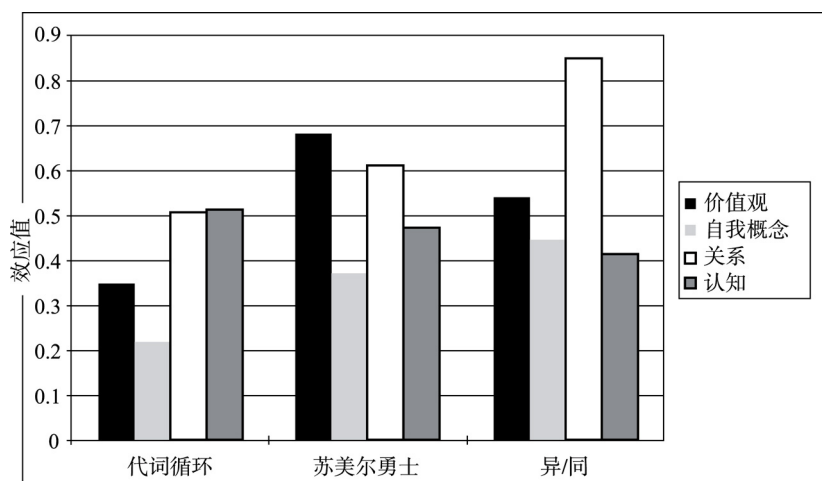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结果的启动任务效应

我们还根据因变量的操作方法，对其进行了更详细的分析。没有必要对关系因变量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因为表3中表明各种对关系进行研究的结果是同质的），而且也不可能详细地分析幸福感变量（因为专注于该结果的研究很少）。下面，我们简要介绍价值观、自我概念和认知方式三个因素的效应。

价值观。价值观是通过标准的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量表，或其他特定的价值观测量来测量的。从表3第四栏中可以看出，这两个测量非常重要。当使用标准价值观量表时，对价值观的启动效应中等且同质（ Q 值不显著）；而当使用其他测量时（即其他价值观测量），启动效应很小且不同质。有几个研究测量的是“中国性”（chineseness）（Bond & Yang, 1982; Ross et al., 2002; Yang & Bond, 1980）。有些对价值观的研究只是基于单个变量，如平等（Briley & Wyer, 2002, 研究3）、公正（Kimmelmeier et al., 2002, 研究3）和重要（Lee et al., 2000, 研究2~4）。

表4 启动效应: 不同启动任务的各项结果效应量是否不同?

启动	结果 (n)				
	价值观	自我概念	关系水平	认知	幸福感
常用启动任务					
代词循环	0.35(2)	0.22(5)	0.51(4)	0.51(8)	-
苏美尔勇士	0.68(2)	0.37(6)	0.61(2)	0.47(3)	0.35(1)
SDFP	0.54(1)	0.44(4)	0.85(3)	0.41(4)	-
乱序句子	0.16(2)	-	0.52(2)	0.29(4)	-
英语用作个体主义启动					
语言启动	0.01(4)	0.16(5)	0.37(1)	0.77(1)	0.54(1)
不常用启动任务					
群体想象	0.44(3)	0.28(4)	-	0.69(3)	-0.39(1)
群体模拟	0.23(2)	-	-	0.27(2)	-
其他/未分类	-	0.22(1)	0.81(3)	0.91(3)	0.11(1)

注: 每个单元呈现的都是效应值的平均权重和用来计算效应值所包括的研究的数目。符号“-”用来表示这个类目中沒有合适的研究。SDFP = 与家人和朋友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任务。

自我概念。自我概念的操作是通过 TST 变体的内容编码 (Kuhn & McPartland, 1954) 和其他自我概念测量来进行的, 如 Singelis (1994) 或 Leung 和 Kim (1997) 的自我建构量表, 或自我 vs. 群体聚焦思维 (Aaker & Lee, 2001, 研究 1 预示和研究 2 预示; Lee et al., 2000, 研究 2 ~ 4)。大多数研究都使用 TST, 所以我们把使用 TST 的研究和使用其他测量的研究进行了对比; 另外, 我们还把所有测量自我概念启动效应的研究与仅使用 TST 的研究进行了比较。这三种调节效应分析发现, 对自我概念的启动效应很小且不同质, 只有一个研究例外。一个单独类目中包括既使用了关系水平集体主义又关注了群体水平集体主义的四个 TST 研究, 其启动效应更接近一般意义上的高水平 ($d = 0.67$, 详见表 3 的 5 ~ 7 栏)。

认知。我们将认知研究分为三类 (社会态度/判断、社会比较和非社会判断), 正如表 3 所示, 三种研究效应中等且差异不显著 ($Q_B = 0.91$), 分别是: 社会态度 $d = 0.50$, $n = 10$; 社会比较 $d = 0.59$, $n = 10$; 非社会判断 $d = 0.52$, $n = 8$ ^①。我们将关注记忆和视知觉的研究归为非社会判断一类。

① 尽管有 8 个研究检验了自我调节聚焦与启动匹配的效应, 但是没有研究报告文化启动对自我调节聚焦的影响。但有 4 个研究关注的是自我调节聚焦与突出价值观时的文化启动匹配的效应 (Briley & Wyer, 2002, 研究 3; Lee, Aaker, & Gardner, 2000, 研究 2 ~ 4), 有 4 个研究关注的是自我调节聚焦与突出其他认知因素诸如记忆时的文化启动匹配的效应 (Aaker & Lee, 2001, 研究 1 ~ 4)。从结果来看, 匹配文化启动与自我调节聚焦有中等效应 (提升和个体主义, $d = 0.42$; 抑制和集体主义, $d = 0.51$; 两个都是 $p < 0.001$)。

样本特征（地区、语言和性别）

我们尽可能仔细地检验了样本特征的潜在影响，因为研究者倾向于关注特定的结果和使用特定的启动任务，以至于根据地区、语言、任务和结果类别出现了不同的集群，这就必然限制了我们的分析，而且也会削弱调节效应分析的有效性。至于所使用的语言，大多数是英语，包括美国、加拿大和中国香港（ $n=44$ ）。语言不同则结果有差异（组间同质性系数为 $Q_B = 44.10$ ， $p < 0.001$ ，详见表5，第二栏），虽然这些结果可能潜在地体现了语言的调节作用，但是我们并不能肯定语言本身可能增强或削弱启动效应。

表5 作为样本特征标识的启动效应

样本特征	Q_B	d_+	95% CI	Q_{wi}
地区 (n)	24.90***			
欧裔美国人，欧洲人 (50)		0.44	0.37, 0.50	178.25***
亚裔北美人 (3)		0.62	0.10, 1.15	3.42
亚洲人 (22)		0.17	0.08, 0.25	59.96***
所用语言 (n)	44.10***			
英语 (44)		0.37	0.30, 0.44	118.90***
德语 (9)		0.28	0.13, 0.44	23.24**
荷兰语 (5)		1.00	0.80, 1.20	21.48***
汉语 (1)		-0.16	-0.59, 0.28	-
性别 (n)	4.18*			
男 (25)		0.10	-0.02, 0.20	65.68***
女 (25)		0.27	0.15, 0.38	49.54**

注 “-” 用来表示该类目中没有合适的研究。 Q_B = 组间同质性系数； d_+ = 效应值的平均权重；CI = 置信区间； Q_{wi} = 组内同质性系数。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至于背景和性别，当以亚洲人作为被试或分析性别时，研究者更倾向于使用弱启动任务或者弱的因变量操作，启动效应也很小（详见表5，第1、3栏）。我们想通过对众多研究的分析做出一个普遍的推论，而不是做出只针对特定的国家、性别、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启动效应的结论，因此样本的特征就非常关键。我们详细检验了地区和性别主效应，以及它们与启动（任务或集体主义启动）或因变量（分类和操作）间潜在的交互作用（见表6）。大多数研究并没有报告被试的性别，所以对性别的分析就受到了限制；然而，结果并不支持“性别在感知个体主义启动和集体主义启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个假设（见表6，性别栏）。

表6 样本特征的效应值: 启动的调节效应
(任务、集体主义的启动水平) 与结果 (类别、操作)

变量	性别		地区		
	男 (<i>n</i>)	女 (<i>n</i>)	欧裔 美国人 /欧洲人 (<i>n</i>)	亚裔 美国人 (<i>n</i>)	亚洲人 (<i>n</i>)
启动的调节效应					
启动任务					
代词循环	0.69(3)	0.60(3)	0.33(15)	1.38(1)	—
苏美尔勇士	0.45(3)	0.67(3)	0.47(10)	—	0.44(2)
SDF	0.55(6)	0.59(7)	0.51(9)	0.32(1)	0.38(1)
乱序句子	0.79(2)	0.75(2)	0.31(5)	—	0.34(3)
语言启动	-0.14(7)	0.05(6)	—	—	0.07(9)
群体想象	0.04(4)	0.05(4)	0.35(7)	—	0.18(6)
群体模拟	—	—	—	—	0.34(3)
其他/未分类	—	—	0.81(7)	0.28(1)	—
集体主义启动水平					
关系自我	0.59(9)	0.59(10)	0.39(27)	0.84(2)	0.38(1)
集体自我	0.04(4)	0.05(4)	0.35(7)	—	0.22(9)
关系与集体自我	0.54(5)	0.70(5)	0.57(18)	0.28(1)	0.38(5)
因变量的调节效应					
结果					
价值观	0.19(7)	0.34(6)	0.50(8)	0.66(1)	0.15(11)
自我概念	0.14(9)	0.24(10)	0.31(15)	1.14(2)	0.16(8)
关系水平	0.80(4)	0.82(5)	0.64(12)	1.21(1)	—
认知	0.73(8)	0.51(8)	0.57(23)	0.51(1)	0.44(7)
幸福感	-0.31(3)	0.02(3)	-0.26(3)	0.06(1)	0.01(2)
操作					
价值观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	—	—	0.39(4)	0.66(1)	0.39(4)
其他价值观	0.19(7)	0.34(6)	0.56(4)	—	0.08(7)
自我概念(全部研究)					
私我	-0.02(7)	0.14(8)	0.16(12)	1.16(2)	0.17(8)
关系自我	-0.23(4)	0.08(4)	0.43(2)	—	-0.20(3)
集体自我	0.34(7)	0.30(7)	0.62(7)	0.42(1)	0.23(7)
关系与集体自我	0.00(2)	0.08(3)	0.11(6)	1.89(1)	0.00(2)
认知					
社会态度/判断	1.86(1)	0.01(1)	0.58(6)	—	0.40(5)
社会比较	0.69(1)	0.65(1)	0.60(10)	0.51(1)	—
非社会判断	0.55(6)	0.57(6)	0.51(7)	—	0.54(2)

注: 括号里呈现的是用来计算效应的研究的数目。当某个类目中没有研究的时候, 就用“—”表示。SDF = 与家人和朋友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任务。

因为地区和语言有重叠,因此我们在调节效应分析中关注地区(见表6,第2栏)。这些分析表明“东方和西方”启动效应的差异可能主要受与任务相关的三个因素的影响。第一,东方和西方使用的启动任务不同;第二,在东方大多数研究启动的都是群体水平集体主义(60%的研究,对亚洲被试产生的效应很小),而在西方启动的则是多种水平的集体主义;第三,在东方进行的研究很多都是把语言作为启动任务(40%的研究),而使用语言作为启动任务的整体效应接近于零($d=0.00$)。

东方和西方的研究都使用了四个任务(苏美尔勇士、SDFF、乱序句子任务、群体模拟)。代词循环任务在西方使用非常普遍却没有在东方使用;群体模拟任务没有任何西方研究使用。还有一些内容很模糊、不能分类的启动任务在西方被试中的整体启动效应很高,但是并没有在亚洲使用。当我们在分析中剔除语言启动任务和未分类任务(因为它们并未形成一个特定的研究群)的启动效应后,东西方的地区效应大小很相似。亚裔族群($d=0.27, n=14$)、欧裔美国人/欧洲人($d=0.38, n=34$)和本土美国人($d=0.32, n=1$)三个族群效应较小,而亚裔美国人($d=0.84, n=2$)效应较大,这表明不同族群对个体主义启动和集体主义启动的敏感性是不同的。直接比较使用了相同任务的那些研究发现,苏美尔勇士(欧裔美国人/欧洲人 $d=0.47$;亚洲人 $d=0.44$)和SDFF(欧裔美国人/欧洲人 $d=0.51$;亚洲人 $d=0.38$)两个任务的效应都属于中等;乱序句子任务的效应则较小(欧裔美国人/欧洲人 $d=0.31$;亚洲人 $d=0.34$);亚洲人似乎较难进行群体想象任务(欧裔美国人/欧洲人 $d=0.35$;亚洲人 $d=0.18$)。这个任务是要求被试想象自己单独或与团体其他成员一起玩网球,可能在亚洲人看来这个任务并不能很好地体现集体主义。综合起来看,当使用苏美尔勇士和SDFF任务时,在东西方都可以启动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某些方面,但是现在还不知道代词循环任务在东方是否有效,乱序句子任务的效应也很小。

我们也检验了启动效应敏感性的区域差异。没有研究使用亚洲被试来验证对关系的启动效应,且关注幸福感的研究也很少,所以不能进行比较。对工作自我概念(working self-concept)启动效应的研究也很难解释地区差异。我们使用各种分析,企图找到亚洲被试在自我概念上的效应低于西方被试的原因。首先我们检验了是否这种差异是因为使用语言作为启动任务造成的,虽然亚洲地区一半的自我概念研究都是使用语言作为启动任务,但是当我们将这些研究剔除之后其效应并没有出现多大提升($d=0.17, n=4$);与此相类似的是,当自我概念研究仅使用TST时,亚洲被

试的效应仍然稳定在低水平 ($d=0.16$, $n=4$)。而在西方被试中,任何集体性(群体水平或者关系水平)的自我概念合在一起时效应都较大。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工作自我概念在亚洲被试中较难被启动,也有可能是编码方向错误或存在西方偏见。

最后,我们关注具有内在同质性启动效应的结果(见图3)。当使用标准价值观量表时,不同群体启动效应中等且相似(欧裔美国人/欧洲人 $d=0.39$; 亚洲人 $d=0.39$),用社会判断和非社会判断评估认知时结果也是如此。我们还检验了能直接比较的各个亚群体研究,发现认知效应中等且地区间没有差异(欧裔美国人/欧洲人 $d=0.56$, $n=26$; 亚裔美国人 $d=0.58$, $n=2$; 亚洲人 $d=0.43$, $n=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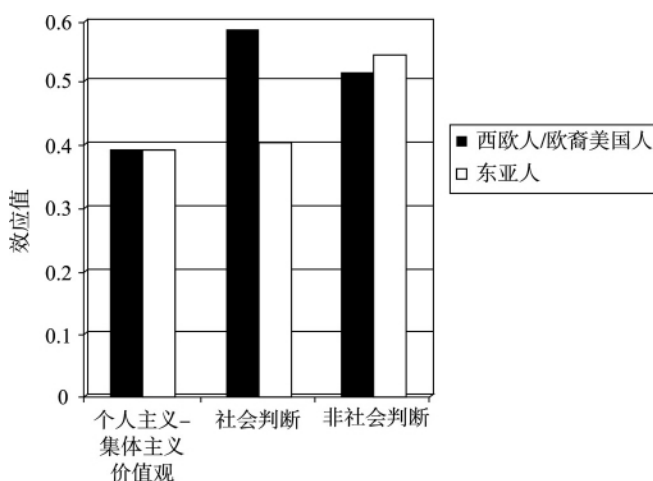


图3 东西方国家的启动效应值

调节效应分析的总结和启示

我们对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启动文献进行全面回顾后发现,即使启动的内容不同,使用的任务类型不同,被试不同,仍然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这种多样性非常有用:如果启动类型不同、所启动的集体主义水平也不同,元分析的结果却是一致的,这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它表明在不同水平的群体(关系群体与集合群体)中集体主义的基本过程是一样的,如果没有调节分析,仅通过跨文化、跨国比较文献无法阐明这一点。同样,不管被试是男性还是女性,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如果启动效应相同,那么也可以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即使被试本质上不同、不同的社会在各方面存在差异,仍然可以确认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产生了效应。实际上,

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启动任务能够引起一致的反应是符合跨文化研究的假设方向的。

就绝大部分研究而言,因为受到所使用的启动任务、任务中启动的集体主义水平、要研究的因变量,以及这些因变量操作方式的调节,启动效应是异质的。因为了解异质性的来源对于更好地理解激活的集体主义或个体主义哪些成分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我们在一些细节上先检验了与方法相关的异质性,然后再检验结果。

语言作为启动项目。一个产生多种不同结果的启动任务就是语言。就像那些关注各种语言的研究中所提到的一样(如 Chiu, Leung, & Kwan, 2007; Liu, 1986; Norenzayan, Choi, & Peng, 2007; Wang & Ross, 2007),语言与文化、记忆和认知相关。使用语言的研究只能限制在那些双语或多语被试上。然而,可以用其他启动任务来操作和研究语言的潜在效应,这样就可以将语言从与文化相关的其他因素中分解出来。我们对目前手头数据的解释是:语言的含义具有高情境性,其意义会受到两方面的影响,即赋予语言的含义和语言与任务本身的相互作用。

后一种解释来源于将语言作为思维工具这个研究传统(Semi, 2000)。这种研究范式既突出了语言的差异来自所倚因素的特点(de Montes, Semin, & Valencia, 2003),又突出了语言结构的不同,尤其突出了与抽象语言相比实义词在描述生活事件和他人时的不同(如动词与形容词相比)。Semin, Görts, Nandram, 和 Semin-Goossens (2002) 以及 Maass, Karasawa, Politi 和 Suga (2006) 还提供了在语言使用上国家间存在差异的证据。例如, Maass 等人发现意大利人喜欢使用抽象词(与情境无关的形容词),而日本人则喜欢使用实词(受具体情境的限制)。这些研究说明,语言并不是简单地引发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它还可能会影响思维的方式(实词和细节关注或者抽象)。

其他启动。与使用语言启动所发现的异质性不同, SDF 和苏美尔勇士任务在加工方式和内容上(价值观、自我概念等)具有稳定的效应。但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变异,尤其是对价值观和自我概念操控不同时,对标准化的价值观操控的效应更大。

对结果的启动效应。在使用 SDF 任务、苏美尔勇士和其他群体想象任务的研究中,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启动对价值观的效应是最突出的;使用代词循环任务、乱序句子任务和语言作为文化的启动任务时,效应较小。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前面的任务都是明显地聚焦于群体成员,所以它能成功地引发价值观;而后面的任务都是以语言为基础且关注语言的结

构。这种更微妙的启动方法出现的结果表明被试可能没意识到启动的是什么,也意味着被试可能未必有一致的价值观。除此以外,群体模拟任务对价值观的启动效应也很小,因为它只是一种最简群体范式,所创造的群体可能不足以引起与集体主义或个体主义相关的价值观。

可能由于同样的原因,SDF和苏美尔勇士任务对自我概念产生的效应相对而言是最高的;虽然这些任务的效应都是处于小到中等的范围,但是当使用间接启动任务时,效应非常小。当自我概念的内容是分析的焦点时,其效应是异质的,而且受所使用的启动任务的影响。因此需要对来自各个地区和不同性别的被试数据进行分析以将效应从中分解出来。然而,异质性可能是不同自我概念测量工具产生的,而且要对有限的文本性反应进行编码以获得稳定的工作自我概念测量是很困难的。

最后一组结果是关于认知方式的。除了乱序句子和群体模拟任务,其他所有启动任务对认知方式的效应都是处于中等到较大的区间内,群体模拟任务产生的效应较弱,可能是由于最简群体的特征造成的。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启动在价值观内容和对内群体成员的亲近感上发生了变化,这与跨国文化模型的预测方向不一致。这表明,可以通过这些启动研究来发现跨文化差异。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启动使认知过程产生了变化(集体主义启动后对不相关认知对象的记忆能力提高)表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会影响思考“什么”和“怎样”思考。

整体来看,通过各种启动任务能够启动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当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突出且易获得时,对价值观、自我概念、关系和认知方式产生影响,这与跨文化文献预测的一致。这些研究表明,通过突出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这些文化因素会影响人的判断和行为。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讨论漏掉了一个问题,即不同启动任务在启动集体主义或个体主义时是否具有同等有效性。不与控制组比较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此,下面的分析将关注可以提供此类信息的亚群体的比较。

与控制组比较

与控制组相比,不管是个体主义启动($d = 0.35$, $95\% \text{ CI} = 0.23, 0.48$)还是集体主义启动($d = 0.34$, $95\% \text{ CI} = 0.21, 0.46$)都显著改变了被试的反应,且集体主义启动和个体主义启动的效应同质($Q_B = 0.04$, $p = 0.85$)。虽然与控制组相比,平均效应大小没什么差别,但是,个体主义启动的效应都是同质的($Q = 11.30$, $p = 0.59$),而集体主义启动的效应则是异质的($Q = 30.56$, $p < 0.01$)。

表7 启动效应与控制组比较：启动的调节效应（任务、集体主义水平）、
结果（类别、操作）及样本特征

变量	比较	
	个体主义 vs. 控制组 (n)	集体主义 vs. 控制组 (n)
启动的调节效应		
启动任务		
代词循环	0.44 (5)	0.30 (5)
苏美尔勇士	0.30 (3)	0.22 (3)
SDFP	0.42 (3)	0.13 (3)
乱序句子	0.08 (3)	0.55 (3)
未分类	0.35 (1)	1.08 (1)
集体主义启动水平		
关系群体	0.43 (8)	0.23 (8)
关系与集体主义群体	0.25 (7)	0.48 (7)
集体主义群体	—	—
因变量的调节效应		
结果		
价值观	0.27 (2)	0.41 (2)
自我概念	0.37 (4)	0.14 (4)
关系水平	0.35 (3)	0.06 (3)
认知	0.39 (6)	0.52 (6)
操作		
自我概念		
私我	0.30 (2)	0.03 (2)
关系自我	0.45 (1)	0.08 (1)
集体自我	0.30 (2)	0.06 (2)
认知		
社会态度/判断	—	—
社会比较	0.33 (4)	0.73 (4)
非社会判断	0.54 (2)	0.03 (2)
样本特征的调节效应		
性别		
男	0.45 (6)	0.23 (6)
女	0.34 (6)	0.29 (6)
地区		
欧裔美国人/欧洲人	0.36 (11)	0.44 (11)
亚洲人	0.34 (3)	0.08 (3)

注：括号中呈现的是分析效应所用的研究的数目；如果某个类目中没有任何研究就用“—”标注。SDFP = 与家人和朋友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任务。

表7 呈现了更详细的分析，该表显示了启动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与控

制组相比较的效应,因为同时包含了群体水平和关系水平,因此集体主义启动效应更强(第一栏和第二栏),个体主义启动产生的效应是显著的(d 从0.27到0.39),集体主义启动也产生了显著的效应,但是大小很不一致,既有弱效应(关系, $d=0.06$;自我概念, $d=0.14$)也有中等效应(价值观, $d=0.41$;认知, $d=0.52$)。我们可以通过检验对自我概念和认知方式的不同操控所产生的效应来做更详细的观察和了解。但这个详细的了解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启动集体主义对自我概念产生的效应如此之小。至于认知,可以与社会比较启动的效应进行对比。在这种情况下,启动集体主义对认知产生的效应要明显大于启动个体主义产生的效应。对非社会判断产生的效应则不好解释,因为只有两个研究做了这种对比。最后是关于样本特征的对比分析(底部的两个栏),我们没有发现性别差异^①。但是在地区对比分析中,仅有三个研究包含亚洲被试,因此研究证据太有限,有可能亚洲被试对启动集体主义不是很敏感,所以效应很小。整体来看,与控制组的比较表明,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都能够被启动,且个体主义对自我概念、关系和价值观的影响要大于集体主义,但是不管启动的是个体主义还是集体主义,它们对认知方式的影响都接近中等。个体主义对东方和西方产生的启动效应是一致的,集体主义的效应不明朗,可能是因为使用了较弱的启动任务。

启动集体主义或个体主义研究结果的稳定性

我们在附录B表B1-B4中,将最后一组分析涉及的研究做了一个总结。这些分析支持了我们的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加上了用以作结论的那些国家,也提供了一些能够证明对行为产生效应的令人信服的例子。回忆附录A中11个启动了任务模糊的研究(仅有6个提供了能够计算效应大小的数据)和21个只启动了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但没有同时启动两者的研究,就会发现:首先,整体来看,效应大小(不加权的平均效应 $d=0.47$,加权的 $d=0.39$,标准差 $SD=0.35$,标准误 $SE=0.05$,95%CI=0.30,0.48)与在主元分析中的效应(不加权的平均效应 $d=0.45$,加权的 $d=0.34$,标准差 $SD=0.34$,标准误 $SE=0.02$,95%CI=0.29,0.39)相近,

① 男性组,个体主义启动-控制条件与集体主义启动-控制条件比较的 $Q_B=0.72$, $p=0.39$;女性组,个体主义启动-控制条件与集体主义启动-控制条件比较的 $Q_B=0.09$, $p=0.77$ 。个体主义启动-控制条件下,男性和女性比较的 $Q_B=0.23$, $p=0.63$,集体主义启动-控制条件下,男性和女性比较的 $Q_B=0.05$, $p=0.82$ 。

二者与虚无效应差异显著（主分析 $Z = 12.90$, $p < 0.001$ ；附录 B 分析 $Z = 8.63$, $p < 0.001$ ），与前述相同，效应量的范围区间是小（价值观和自我概念）到中等（关系和认知方式）。然而，在这个分析中，效应间的差异是不显著的（组间同质性系数 $Q_B = 1.84$, $p = 0.61$ ）。这些研究中，仅有两个研究关注价值观（Bovasso, 1997; Briley & Wyer, 2001, 研究 3）。其中后者非常重要，因为虽然启动本身不是很清楚，但是它表明对美国 and 香港被试的价值观都影响了启动效应。由于有些研究仅启动了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并检验了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对自我概念、关系、价值观和认知的影响，这些研究试图从每个心理建构或独特的结果中分解出激活的成分，因此我们将它们添加到了主元分析的结果中，并进行详细讨论。

关系

除了一个很难解释的启动研究（Mandel, 2003, 研究 2）外，其他 13 个研究都检验了启动集体主义（ $n = 7$ ）或个体主义（ $n = 6$ ）对关系的效应；结果与主元分析中发现的效应相似。此外，这些研究还为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影响行为的过程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启发。美国大学生在使用“我们”描述关系之后，比起使用“自己”和单个他人来描述关系，感觉与其他人更亲近（Fitzsimons & Kay, 2004, 研究 1~4）。当用第一人称代词（我）而不是第三人称代词（他）时，荷兰被试表现出更少的自动模仿（van Baaren et al., 2003, 研究 1），可能是因为“我”启动了与他人的不同和分离而非亲近。当用自己的名字而不是一个中性词作为启动时，荷兰被试和同伴坐得更近（Holland et al., 2004, 研究 1）。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当其他人与自己相关时，他人对自己才是有意义的。

自我概念

除了三个研究的启动任务和结果很难解释外（Chen et al., 2004, 研究 2; Gaertner et al., 1999, 研究 3; Kanagawa et al., 2001），仅启动了集体主义或个体主义的研究表明其对自我概念的效应（ $d = 0.35$ ）与主元分析中的效应大小相似。有两个研究对个体主义启动任务中的微观过程进行了检验。使用“我”或一个中性词作为内隐启动，Mussweiler 和 Bodenhausen（2002, 研究 3）发现，以“我”作为启动词的美国男性被试与以中性词作为启动词的男性被试相比，能更快地识别描述女性特征的单词，对描述自我的单词则识别较慢。这使得对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自我概念内容的典型对照变得复杂，因为这些结果揭示了个体主义自我概念的内容包含了关于社会分类关系的信息。

Stapel 和 Koomen (2001, 研究 4) 分解了个体主义的启动效应, 发现使用代词循环任务能够提升荷兰被试的自我概念, 但启动个体主义不一定会引发这个效应。当他们使用乱序句子任务从自我提升中分别引发分离和区别时发现, 启动个体主义的分离和区别方面会影响自我提升。因为自我提升被描述为“个体主义西方综合征”(Markus & Kitayama, 1991) 的一部分, 因此需要在东方被试中使用 Koomen, Mussweiler 和 Bodenhausen (2002) 启动任务来揭示是否以第一人称代词作为启动项能够对自我提升和社会成员分类产生同等影响。

认知

除了一个很难解释的启动研究外, 有四个研究检验了启动集体主义 ($n=3$) 或个体主义 ($n=1$) 对认知的效应; 效应大小与主元分析结果相似。值得注意的是, Brewer 和 Gardner (1996, 研究 1~2) 认为不管“我们”启动的是关系(如去城市的朋友)还是一个大的群体(如坐在体育场里的所有人), 都会产生同等启动效应, 这表明至少美国被试的群体水平和关系水平的集体主义启动效应是一致的。

单一启动研究总结

通过研究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启动对关系、价值观、自我概念和认知的影响发现, 不管是同时启动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被试间, 与主分析一致)还是仅启动了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 其效应都是相似的。这些研究既支持了从元分析中得出的“启动效应是稳定的”这一结论, 同时也增加了启动的方法和结果的适用广度。至于所包含的地区, 从研究中使用的被试可以看出, 包括美国、德国、荷兰、中国香港、加拿大、英国和日本。这组研究也为理解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可能的潜在过程提供了一些视点。有几个研究开始揭示个体主义启动的影响, 做法是从积极独特性(positive uniqueness)的启动效应中分离出差异启动的影响, 以及证明启动自我后即使是在美国人中也可以启动突出的社会认同。这些结果很重要, 因为它们超越了简单的跨文化比较, 且为检验诸如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等文化因素提供了一个机制。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promise), 从这些微观过程中得出的结果需要在社会情境中验证, 而不是在典型的个体主义情境中验证。

元分析结果与其他证据的整合

Oyserman, Coon 和 Kemmelmeier (2002) 对欧裔美国和其他族群之间的跨国比较研究进行元分析后发现, 他们在支持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上存在中等程度的差异, 但是依然要注意一些问题。因为跨国比较都

是相关研究且不能提供过程，所以他们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来自不同社会的个人是否总是有不同的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价值观？还是这些价值观的重要性和突出性依赖于当下所想到的内容？

我们对启动文献的回顾为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与价值观、与别人约会的方式 (ways of engaging others) /自我概念的内容和认知风格等存在联系提供了跨国文献的证据。使用控制组对比的研究表明，不管研究的地区是美国、欧洲 ($d=0.36$) 还是亚洲 ($d=0.34$)，被试判断和行为的改变都受个体主义启动的影响。美国 and 欧洲被试判断和行为的变化受集体主义启动影响的效应是一致的 ($d=0.44$)。而对亚洲人进行的研究并没有出现集体主义启动效应 ($d=0.08$)；我们在结果部分注意到，部分原因可能是亚洲被试研究中启动任务较弱、启动任务与语言间存在潜在的混淆变量造成的。即使存在这些问题，现有的元分析结果仍然加强了文化因素与心理建构的因果关系。就像我们下面所讨论的那样，有些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对心理建构影响更大，但是将来的研究还需要把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引发的效应与其他文化因素（如荣誉和权力）产生的效应区分开来。

在跨国文献中研究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对价值观的影响发现：不同类型的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启动任务有中等效应 ($d=0.40$)；与控制组相比，集体主义启动 ($d=0.42$) 和个体主义启动 ($d=0.27$) 对价值观都有作用。相较于以集体主义为线索，当启动个体主义时，被试更支持个体主义价值观。虽然这些证据大多来自欧裔美国人和西欧人，但是对亚洲人的研究——主要是对香港华人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结果。启动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改变了与其相关的价值观的重要性，这与跨国文献中所发现的效应一致。对欧裔美国人 ($d=0.39$) 和亚洲人 ($d=0.39$) 产生的效应是相似的，而且效应大小受所使用任务的影响，当使用 SDFF 和苏美尔人任务时，效应值的范围为 $0.54 \sim 0.68$ 。当与无启动的控制组比较时，启动集体主义或个体主义都会产生效应。

至于关系研究，评估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启动对与他人关系产生的效应发现，效应值范围处于中等到较大 ($d=0.61$) 范围内。与控制组相比，启动个体主义 ($d=0.37$) 和启动集体主义对关系都有效应 ($d=0.14$)。遗憾的是，研究关系的文献仅限于西方被试，我们仅找到一个使用亚裔美国人作为被试来评估对关系的启动效应的研究 (Gardner et al., 2004)，因此，需要在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进一步研究。

跨国文献发现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对自我概念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使用启动任务将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从其他潜在影响中分离出来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两类文献都强烈地依赖对 TST 编码获得的自我概念信息。效应大小依赖于所分析的焦点是自我概念的哪个方面,当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被一起编码且非常突出时效应值很大 ($d = 0.67$),否则效应值很小(所有 TST 结果合并, $d = 0.23$; 所有非 TST 结果合并, $d = 0.18$)。不管对自我概念采取何种操作,当比较启动组和控制组时,个体主义启动对自我概念的效应 ($d = 0.35$) 总是大于启动集体主义所产生的影响 ($d = 0.06$),这表明个体主义在抑制自我概念社会内容的功能方面要大于集体主义对其产生的促进作用。当把集体自我作为分析的焦点时,其效应无性别差异,但是对亚洲人的效应小于对西方族群的效应。

最后是认知风格,不管何种操作和启动任务,对认知风格产生效应都处于较高的中等范围 ($d = 0.52 \sim 0.59$)。此外,当与控制组比较时,启动个体主义 ($d = 0.39$) 和启动集体主义 ($d = 0.52$) 产生的效应相当,这表明两种文化架构都影响认知方式。至于地区,亚洲 ($d = 0.44$) 与美国或欧洲 ($d = 0.52$) 的效应也很接近。效应大小与跨国研究的结果类似,这支持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影响认知方式的观点,虽然他们不能剖析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相对于其他潜在相关变量的相对效应。整体来看,集体主义增加了包含同化和关联信息而不是对比和区别信息的可能性。同样,个体主义增加了使用对比、区分而不是融合和连接的可能性。因此,启动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改变了镶嵌图形认知,改变了识别由其他小字母组成的大字母的速度 (Kühnen & Oyserman, 2002),也提高了 Stroop 任务的操作速度 (Oyserman et al., 2008)。这些效应与 Norenzayan 等 (2007), Nisbett (2003) 和 Kitayama (如 Kitayama, Duffy, Kawamura, & Larsen, 2003) 在跨国文献中发现的结果类似。

结论

研究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效应的跨国文献令人印象深刻但也存在缺陷。令人印象深刻是因为不管因变量是什么,如何对因变量测量进行操作,样本特征是什么,结果都证明了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所预测的个体价值观差异,也证明了这些差异对个体的心理建构有影响。跨国研究也显示了每个人在如何定义自己、如何想象与他人的关系、什么是价值观,以及在特定的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框架中思维是如何运作的,诸如

此类问题上都存在差异。这些结果很重要,因为跨国比较具有生态效度;毕竟,它们展示的是真实群组的真实差异。因为这些差异是独特的,并与假设的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效应一致,因此研究者认为这些差异应归因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然而,跨国比较并不能为这个因果推断提供结论性支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认为跨国研究获得的证据可圈可点。

举例来说,有两个跨国研究检验了文化对认知的影响。Jensen 和 Whang (1994) 研究了洛杉矶四到六年级的学童,发现中国儿童在瑞文推理测验上的分数比欧裔美国儿童高出三分之一标准差,这个测验任务的一般方式是模式匹配和从图片上找出缺失的部分。Kitayama 等人 (2003) 的研究显示了美国人和日本人在画线任务中的细微差异。当需要回忆线条时,如果提供一个相关的背景,则日本被试的成绩更好;如果不提供背景,则美国被试的成绩更好。整体来看,两组研究都强烈地表明文化会影响认知方式。但是他们并不能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即文化的哪个方面是最重要的,文化的激活成分是否只是对特定社会(如中国、日本)有影响还是对各种社会(如那些高集体主义或低个体主义的社会)都有影响。

本文通过文献回顾和分析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继续努力的建议。本文使用实验的逻辑来超越(move beyond)生态效度,但是专注于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维度的跨国研究结果的因果关系很模糊。综观所有研究,需要提出的是:文化是否与认知过程存在联系,比如,当集体主义或个体主义的某方面更突出或易获得时,二者间的联系是否会更大。

这些研究的假设是建立在跨国对比研究的基础上的,因为它们提供了跨国差异的一般信息。通过比较那些可能具有不同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群体或国家的效应大小,表明结果取决于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相对影响。但是要实现从观察到的判断和行为具有跨国差异到确定这些差异取决于个体主义还是集体主义这个飞跃,需要假定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变得重要和易获得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并因而影响判断和行为。这意味着在当前的主要分析中必须做外显的对比。启动技术通过厘清被试在做出判断或行为反应时,什么对于被试是重要的和易获得的这种方法,增强了对文化因素的测量。通过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各种实验条件下,就可以防止将影响归因于个人水平的差异或个性因素。随机分配被试就不能把差异归因为个体水平或者人格因素。通过与控制组作比较,研究者可以进一步探讨国家间或启动效应的差异是更多地取决于个体主义的影响还是集体主义的影响。

这个方法也导致了后续的研究,即检验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成分的相对效应,比较集体主义或个体主义的效应,比较其他文化因素的效应。非常有必要强调的是,这儿的逻辑并不是要把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效应从其他相关因素或混淆变量(如国民生产总值、失业)中分离出来,而是探讨在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易获得和突出时,及与控制组比较时,其效应值大小,这个方法可以检验各种个体和社会中的文化因素。

我们对启动文献的回顾表明,启动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在跨国文献假设的方向上效应值中等。分析结果在两方面突破了这些文献。第一,在东方和西方都会出现启动效应,而且启动效应在各种设计条件下都是稳定的,不管使用的启动任务是不是相同,不管是同时受到集体主义启动和个体主义启动的影响,还是仅受到其中之一的影响。第二,虽然取样的国家有限,也缺乏非学生被试,分析的结果依然可以超越跨国研究,因为我们能够证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这些效应并不只是对特定社会或特定内容有意义,而是与心理构建有因果关系。

对国家(中德)间启动效应进行直接比较的研究为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激活成分存在效应提供了直接证据(Haberstroh et al., 2002)。在东方(中国香港)和西方(美国)探讨启动效应的重复研究则证明了启动后被激活的成分具有普遍影响而非只是影响某个国家(Aaker & Lee, 2001; Briley & Wyer, 2001; Gardner et al., 1999; Lee et al., 2000)。控制组与启动组比较的结果说明,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多种效应与因变量密切相关。对效应的检验也揭示了迄今为止研究所存在的地区差距。虽然有在欧洲进行的研究,但数据大多来自德国和荷兰。如果其中包含了有平等传统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那么结果可能会不同;而且其中也没有包含在其他方面可能不同的南欧和东欧。例如东欧,近年来的政治历史可能改变集体主义的含义。同样,没有研究在拉美国家、具有伊斯兰传统的国家和非洲国家进行。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是如何操作并因而如何使用启动任务,可能依赖于使用哪个国家的被试,因为对不同国家来说,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意义可能有差异。这些差异意味着分析结果可能有重大遗漏和不足。

我们对集体主义的理解可能受到一个事实的限制:即这个领域只是关注西方和东方社会,这些社会中当下都没有民族或者部落冲突。如果在非洲和中东的背景下研究集体主义,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如 Nisbett, 2003)因为这些地区是将荣誉而不是谦虚与集体主义联系在一起。集体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内群体更团结的同时也使得外群体的分界线更突出,在存在

群际冲突的国家内启动集体主义可能会更关注界限而不是包含。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启动集体主义可能会引发边界感，与集体主义相联系的认知可能会更多的涉及分离和对比，而不是跨国文献中所发现的包含和同化。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突破当下这些仅对西欧、美国和东亚尤其是中国香港的研究，以更深入地了解在世界其他地区集体主义是如何作用的，哪些其他文化因素可能会和集体主义重叠。这种更宽广的理解有利于从更多的目标模式（区别身份关注、谦虚关注和荣誉关注）发展出更多有针对性的实验任务，以检验这些新的假设和猜想。

因为目前的发现表明，当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变得突出和易获得时，它们会激活相关的知识和程序，或激活思考社会和物理（客观）世界的方式，因此在模型构建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当启动个体主义时，头脑中的认知工具或过程专注于区分和分离；当启动集体主义时，头脑中的认知工具或过程则聚焦于连接、整合和一致，将自己与背景和其他人同化。这个证据超越了先前的跨国研究，也可以用于探讨潜在的认知过程。

虽然该证据具有普遍的支持性和显著的一致性，但是它也表明了当测量变量不同、启动任务也不同时，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启动效应是异质的。这个异质性是有用的，因为启动任务和结果变量的测量与什么是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激活成分的理论建构有关，也与在日常生活中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有多重相关。让被试单独坐或坐在一起，让他们以技术为依据或以家庭背景为依据挑选苏美尔勇士等，不管启动集体主义还是个体主义，结果都是显著的。这表明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是能够以多种方式启动的。

此外，很容易证明启动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同时有助于认知方式的转变，这增加了先前跨国研究结果的稳定性，说明不同国家的确有不同的认知方式。虽然自我概念从理论上是相关的且会受到由文化引起的内容和过程知识的潜在影响，但重要问题是需要检验的是自我概念而非其他过程性知识驱动启动效应。例如，当启动材料中包含或排除自我并包括更多国家时，对同一启动任务（乱序句子或阉下启动）的效应进行检验是非常有用的。如果在启动材料中包含自我，在社会中有很强的效应，那么这将会为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对自我概念具有可能的中介作用提供强有力的实证支持（如 Kitayama, Duffy, & Uchida, 2007; Markus & Kitayama, 1991）。当加入更多国家后，如果效应并没有受到当前测量的自我概念的中介，那么未来的研究需要为自我概念的相关差异提供一个更好的操作或需要证明另一种中介过程存在。

更一般地说,增加文化启动任务的具体性能够解决两个问题:其一,启动集体主义或个体主义只能影响哪种认知过程?其二,哪种认知过程仅在特定的国家中被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启动?这需要未来的研究既去探讨更普遍的认知过程,也去探讨那些个体主义者或集体主义者根深蒂固的认知过程或认知方式。通过揭示这些效应,就有可能知道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如何启动那些有重叠但不相同的过程,如整体的或者特定的程序,抑制或促进程序,抽象或具体程序。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比较研究。例如 Shavitt, Lalwani, Zhang 和 Torelli (2006) 使用 Triandis 的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水平和垂直概念来说明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内部的不同效应。研究表明,增加了这个垂直概念厘清了跨文化差异。虽然没有试图通过启动任务来分离这些效应,但是他们也为此提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任务 (Oyserman, 2006)。这些任务可以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效应从权力和等级观念的效应中分离出来。在我们自己的实验室里,我们发展了一个综合模型,来研究众多文化因素如何共同解释文化对心理建构的影响 (Oyserman & Lee, 2007, in press)。未来的研究通过深入分析相对立的三个理论模型也许可以着手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跨国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这些文化因素而非另外一些引起的。

当我们更多地与来自不同社会的人交往时,现代群际冲突是不会消亡的,所以风险很高。如果一个以社会认知为基础模型以关注突出和易获得的文化框架为前提,那么它会非常有用。毕竟,人类的思维大多发生在某个社会背景中,而且随着文化对社会判断的影响成为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部分,对社会情境认知的探索已经成为目前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主助推器 (Schwarz, 2000)。这是因为,就像威廉·詹姆斯 (1890) 所提到的,思想是为了行动,所以认为社会背景提供了一个意义产生的框架是合理的。在这个框架里,有些东西似乎很明显、简单、自然和真实,有些则相反。在这个框架中,我们可能会使用易获得的多种信息加工策略,而很少使用不容易想到的一些策略 (Schwarz, 2000; Taylor, 1998)。我们目前对文献的回顾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在环境中组织意义的方式之一是由突出的和易获得的文化(可操作的,如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所提供的,而且,一旦某个特定的文化被启动,很可能也会带来与之相关的目标、动机、行为、解释信息的方式和加工策略。

附录 A

表 A1 元分析中使用的价值观研究

使用启动任务和集体主义水平启动组织的研究	大学生样本 (特殊情况如语言除外)	测量	期望的个体主义启动效应	期望的集体主义启动效应	效应值 (<i>d</i>)
欧洲传统					
关系集体主义					
代词循环任务					
Gardner et al. (2004)	24 欧裔美国人 (英语)	Schwartz (1992); Triandis et al. (1990)	持有 IND 价值观	持有 COL 价值观	0.24
Gardner et al. (1999, 研究 1)	45 欧裔美国人 (英语)	Schwartz (1992); Triandis et al. (1990)	持有 IND 价值观	持有 COL 价值观	0.24
SDFE 任务: 写一个主语“我”或者宾语“我”特征的短文					
Kemmelmeier et al. (2002, 研究 3)	72 美国人 (英语)	对于医生帮助自杀的态度	个人选择更多	个人选择更少	0.54
既有关系集体主义又有群体集体主义					
苏美尔勇士故事					
Gardner et al. (1999, 研究 1)	45 欧裔美国人 (英语)	Schwartz (1992); Triandis et al. (1990)	持有 IND 价值观	持有 COL 价值观	0.24
Gardner et al. (1999, 研究 2)	50 欧裔美国人 (英语)	Schwartz (1992); Triandis et al. (1990)	持有 IND 价值观	持有 COL 价值观	0.94
乱序句子任务					
Briley & Wyer (2001, 研究 4)	53 欧裔美国人 (英语)	Triandis (1995)	IND 价值观更多, COL 价值观更少	IND 价值观更少, COL 价值观更多	0.12
群体集体主义					
群体想象任务 (想象网球赛单打 vs. 团体赛)					
Lee et al. (2000, 研究 2)	72 美国 (英语)	感知重要性	价值提升情境	价值抑制情境	0.52
Lee et al. (2000, 研究 3)	98 美国 (英语)	感知重要性	价值提升情境	价值抑制情境	0.55
Lee et al. (2000, 研究 4)	65 美国 (英语)	感知重要性	价值提升情境	价值抑制情境	0.72

续表

使用启动任务和集体主义水平启动组织的研究	大学生样本 (特殊情况如语言除外)	测量	期望的个体主义启动效应	期望的集体主义启动效应	效应值 (<i>d</i>)
亚洲北美传统					
关系集体主义					
代词循环任务					
Gardner et al. (2004)	22 亚裔美国人 (英语)	Schwartz (1992); Triandis et al. (1990)	持有 IND 价 值观	持有 COL 价 值观	0.66
亚洲传统					
既有关系集体主义又有群体集体主义					
苏美尔勇士故事					
Gardner et al. (1999, 研究 2)	56 中国香港人 (英语)	Schwartz (1992); Triandis et al. (1990)	持有 IND 价 值观	持有 COL 价 值观	0.84
乱序句子任务					
Briley & Wyer (2001, 研究 2)	26 中国香港人 (英语)	Triandis (1995)	持有 IND 价 值观	持有 COL 价 值观	0.00
Briley & Wyer (2001, 研究 4)	29 中国香港人 (英语)	Triandis (1995)	IND 价值观更 多, COL 价 值观更少	IND 价值观更 少, COL 价 值观更多	0.34
群体水平集体主义					
群体模拟任务					
Briley & Wyer (2002, 研究 1)	46 中国香港人 (英语)	与平等有关的格言	持有更少	持有更多	0.62
Briley & Wyer (2002, 研究 3)	93 中国香港人 (英语)	与平等有关的格言	持有更少	持有更多	0.05
群体想象任务 (想象网球赛单打 vs. 团体赛)					
Lee et al. (2000, 研究 3)	中国香港人 (汉语)	感知重要性	价值提升情境	价值抑制情境	0.19
Lee et al. (2000, 研究 4)	中国香港人 (汉语)	感知重要性	价值提升情境	价值抑制情境	0.31
语言启动 (假设英语是个体主义启动, 汉语是集体主义启动)					
Bond & Yang (1982)	香港男性 (92 英语, 92 文)	信念刻板印象量表 (Ho, 1977); 中 国性 (Yang & Bond, 1980); 罗克 奇价值观量表 (Rokeach, 1973)	对中国人信念 刻板印象更 少; 中国价 值观	更多信念刻板 印象; 中国 性; 中国价 值观	-0.23

续表

使用启动任务和集体主义水平启动组织的研究	大学生样本 (特殊情况如语言除外)	测量	期望的个体主义启动效应	期望的集体主义启动效应	效应值 (<i>d</i>)
Ralston et al. (1995)	104 香港经理 (52 英语, 52 汉语) ^a	Schwartz (1992)	持有 IND 价值观	持有 COL 价值观	0.27
Ross et al. (2002)	52 生活在加拿大的中国人 (主要来自香港) (29 英语, 23 汉语) ^b	中国文化观点	更少	更多	1.70
Yang & Bond (1980)	121 中国香港人 (60 英语, 61 汉语)	中国文化实践	更少	更多	-0.42

注: 被试的详细特征在发表的文章中已有描述, 只有国籍是交代了的, 这类信息已经提供(如美国)。如果样本是根据种族或者民族描述的(如欧裔美国人), 这类信息也已经提供。IND = 个体主义, COL = 集体主义。SDF = 家庭与朋友相似和差异任务。

a 只有香港被试 ($n=140$) 是语言启动(英语或者汉语)也被包括在计算英语启动效应的样本里了。美国数据没有包括在内。

b 只有中国被试 ($n=52$) 是语言启动(英语或者汉语), 也被包括在计算语言启动的样本里了, 加拿大被试没有包括在内。

表 A2 元分析中使用的自我概念研究

使用启动任务和集体主义水平启动组织的研究	大学生样本 (特殊情况如语言除外)	测量	期望的个体主义启动效应	期望的集体主义启动效应	效应值 (<i>d</i>)
欧洲传统					
关系集体主义					
代词循环任务					
Gardner et al. (2004)	24 欧裔美国人 (英语)	TST	更独立的自我描述	更依存且群体化的自我描述	0.89
Gardner et al. (1999, 研究 1)	45 欧裔美国人 (英语)	TST	更独立的自我描述	更依存且群体化的自我描述	0.88
Levine et al. (2003, 研究 1)	121 美国人 (102 欧裔美国人) (英语)	SCS	更独立的自我描述	更依存且群体化的自我描述	0.17
Levine et al. (2003, 研究 2)	49 欧裔美国人 (英语)	SCS	更独立的自我描述	更依存且群体化的自我描述	-0.09
Levine et al. (2003, 研究 3)	361 美国人 (303 欧裔美国人) (英语)	SCS	更独立的自我描述	更依存且群体化的自我描述	

续表

使用启动任务和集体主义水平启动组织的研究	大学生样本 (特殊情况如语言除外)	测量	期望的个体主义启动效应	期望的集体主义启动效应	效应值 (<i>d</i>)
Trafimow et al. (1991, 研究 1)	24 美国人 (英语)	TST	更独立的自我描述	更群体化的自我描述	0.42
Kühnen et al. (2001, 研究 2)	76 德国人 (德语)	SCS 修正项目 (Singelis, 1994)	更情境独立的自我描述	更情境依赖的自我描述	0.53
Vohs & Heather-ton (2001, 研究 3)	23 美国女性 (英语)	TST	更独立的自我描述	更依存且群体化的自我描述	0.44
未分类任务: 阅读自己或者家人喝葡萄汁片段					
Aaker & Lee (2001, 研究 1 前测)	51 美国人 (英语)	关于自己和他人的思维	更独立	更依存 (包括家庭)	0.22
既有关系集体主义又有群体集体主义					
苏美尔勇士故事					
Gardner et al. (2002, 研究 2, 预实验)	62 美国人 (35 女性, 27 男性) (英语)	TST 修正版 (6 题)	更少群体化的自我描述	更群体化的自我描述	0.67
Gardner et al. (1999, 研究 1)	45 裔裔美国人 (英语)	TST	更独立的自我描述	更依存且群体化的自我描述	0.88
Levine et al. (2003, 研究 2)	50 裔裔美国人 (英语)	SCS	更独立	更依存且群体化	-0.09
Trafimow et al. (1991, 研究 2)	48 美国人 (英语)	TST	更独立的自我描述	更群体化的自我描述	0.42
群体集体主义					
群体想象任务 (想象网球赛单打 vs. 团体赛)					
Aaker & Lee (2001, 研究 2 预实验)	19 美国人 (英语)	关于自己和他人的思维	更独立	更群体化 (包括队友)	
Lee et al. (2000, 研究 2)	72 美国人 (英语)	关于自己和他人的思维	更独立	更群体化 (包括队友)	0.27
Lee et al. (2000, 研究 3)	98 美国人 (英语)	关于自己和他人的思维	更独立	更群体化 (包括队友)	0.48
Lee et al. (2000, 研究 4)	65 美国人 (英语)	关于自己和他人的思维	更独立	更群体化 (包括队友)	0.42

续表

使用启动任务和集体主义水平启动组织的研究	大学生样本 (特殊情况 如语言除外)	测量	期望的个体主义启动效应	期望的集体主义启动效应	效应值 (<i>d</i>)
美国印第安或者本土美国人传统					
既有关系集体主义又有群体集体主义					
Trafimow & Smith (1998)	62 本土美国人, 混合学生, 其他成年人	TST	更独立的自我描述	更群体化的自我描述	0.32
亚洲北美传统					
关系集体主义					
代词循环任务					
Trafimow et al. (1997)	63 香港大学生和高中生(20 英语, 43 汉语)	TST	更独立的自我描述	更依存和群体化的自我描述	2.18
既有关系集体主义又有群体集体主义					
苏美尔勇士故事					
Trafimow et al. (1997)	61 香港大学生和高中生(21 英语, 40 汉语)	TST	更独立的自我描述	更群体化的自我描述	0.09
群体集体主义					
群体想象任务(想象网球赛单打 vs. 团体赛)					
Aaker & Lee (2001, 实验2 预实验)	20 中国香港人(英语)	关于自我和别人的思维	更独立	更群体化(包含队友)	0.43
Lee et al. (2000, 研究3)	117 中国香港人(汉语)	关于自我和别人的思维	更独立	更群体化(包含队友)	0.14
Lee et al. (2000, 研究4)	83 中国香港人(汉语)	关于自我和别人的思维	更独立	更群体化(包含队友)	0.05
语言启动(假设英语为个体主义启动; 汉语, 宿务语, 或尼泊尔语作为集体主义启动)					
Kimmelmeier & Cheng (2004)	126 中国香港人(96 大学生, 30 中学生), 学生(63 英语, 63 汉语)	SCS(Singelis 1994)	更独立	更依存和群体化	0.21
Ross et al. (2002)	52 在加拿大的中国人(多数是中国香港人)(29 英语, 23 汉语) ^a	TST 修正版; 自尊量(Rosenberg 1965)	更独立的自我描述; 高自尊	更依存和群体化; 低自尊	0.46

续表					
使用启动任务和集体主义水平启动组织的研究	大学生样本 (特殊情况如语言除外)	测量	期望的个体主义启动效应	期望的集体主义启动效应	效应值 (<i>d</i>)
Trafimow et al. (1997)	152 香港大学生和高中生 (76 英语, 76 汉语)	TST	更独立的自我描述	更群体化的自我描述	0.70
Watkins & Gerong (1999)	166 高中生 (年龄 <i>M</i> = 16) 菲律宾学生 (83 汉语, 83 宿务语)	TST	更独立的自我描述	更依存和群体化 (既有小群体又有大群体) 自我描述	-0.04
Watkins & Regmi (2002)	171 尼泊尔 (年龄 <i>M</i> = 24) (98 英语, 73 尼泊尔语)	TST	更独立的自我描述	更依存和群体化 (既有小群体又有大群体) 自我描述	-0.27

注：被试的详细特征在发表的文章中已有描述，只有国籍是交代了的，这类信息已经提供（如美国）。如果样本是根据种族或者民族描述的（如欧裔美国人），这类信息也已经提供。TST = 我是谁 20 题自我陈述测验（Twenty Statements Task）（Kuhn & McPartland, 1954）；SCS = 自我建构量表（Self-Construal Scales）（Leung & Kim, 1997，另外的使用会另有说明）；SDFP = 家庭和朋友圈相似性和差异性任务。

a 只有中国出生的被试（*n* = 52）是语言启动（英语或者汉语），并被包含在了语言启动效应的分析中。加拿大数据没有包含在内。

表 A3 元分析中使用的关系研究

使用启动任务和集体主义水平启动组织的研究	大学生样本 (特殊情况如语言除外)	测量	期望的个体主义启动效应	期望的集体主义启动效应	效应值 (<i>d</i>)
欧洲传统					
关系集体主义					
代词循环任务					
Gardner et al. (2004)	24 欧裔美国人 (英语)	社会责任	更自我定向	更群体定向	0.74
Gardner et al. (1999, 研究 1)	45 欧裔美国人 (英语)	感知帮助社会责任 (Miller et al., 1990)	弱	强	0.74
Kemmelmeier (2003, 研究 1)	48 美国人 (34 欧裔美国人) (英语)	公正偏爱	喜欢机会平等	喜欢平权法案	0.60
Utz (2004a, 研究 1)	68 荷兰大学生 (荷兰语)	亲社会选择	少	多	0.06

续表

使用启动任务和集体主义水平启动组织的研究	大学生样本 (特殊情况如语言除外)	测量	期望的个体主义启动效应	期望的集体主义启动效应	效应值 (<i>d</i>)
SDFF 任务					
Holland et al. (2004, 研究2) ^a	27 荷兰人 (荷兰语)	被试坐的椅子与另外一个人坐的椅子中间间隔的椅子数	离得很远	离得很近	0.85
Vohs & Heatherton (2001, 研究3)	23 美国女性 (英语)	其他人与被试的相似性	低	高	1.19
SDFF 为基础的任务: 阅读个性化段落; 写作购物回忆; 用关键词写句子					
Kemmelmeier (2003, 研究2)	54 美国人 (44 欧裔美国人, 5 亚裔美国人) (英语)	对平权法案有愉快的反应	少	多	0.72
Mandel (2003, 研究1)	53 美国人 (英语)	支持感; 回避社会冒险	弱	强	0.52
苏美人勇士任务 (混合关系和群体水平集体主义)					
Gardner et al. (1999, 研究1)	45 欧裔美国人 (英语)	感知帮助社会责任 (Miller et al., 1990)	弱	强	0.74
Mandel (2003, 研究1)	53 美国人 (英语)	支持感; 回避社会冒险	弱	强	0.52
既有关系集体主义又有群体集体主义					
乱序句子任务					
Utz (2004b)	63 德国人 (德语)	游戏中的合作与目标	缺少合作, 自我获得目标	更多合作, 他人获得目标	0.30
van Baaren et al. (2003, 研究2)	32 荷兰人 (英语)	模仿	少	多	0.98
未分类任务					
Wenzel (2002, 研究2) ^b	49 德国人 (德语)	社会责任 (权利判断)	更基于群体价值 (愿意帮助典型群体成员)	更利己 (愿意给自己)	1.32
Mandel (2003, 预研究) ^c	89 美国人 (英语)	产品选择; 冒险	不太愿意进行经济冒险	更愿意进行经济冒险	0.73
俄国 - 美国人传统					
语言启动 (假设英语为个体主义启动, 俄语为集体主义启动)					

续表

使用启动任务和集体主义水平启动组织的研究	大学生样本 (特殊情况如语言除外)	测量	期望的个体主义启动效应	期望的集体主义启动效应	效应值 (<i>d</i>)
Marian & Kaushanskaya (2004)	47 双语的俄裔美国成年人 (年龄 $M = 21$; 组内变量, 一半为俄语, 一半为英语)	记忆(回忆)	更个人化, 不以他人为中心, 个人代词比例高, 群体代词比例低	更关系化, 以他人为中心, 个人代词比例低, 群体代词比例高	0.37
亚洲北美传统					
关系集体主义					
代词循环任务					
Gardner et al. (2004)	22 亚裔美国人 (英语)	社会责任	更自我定向	更群体定向	1.21

注: 在发表的文章中被试的资料有详细的描述, 只有国籍是交代了的, 这类信息已经提供(如美国)。如果样本是根据种族/民族来描述的(如欧裔美国人), 这类信息也已经提供。

^a 用家庭和朋友相似性与差异性任务(SDFF)启动, 是通过写作而不是思考来完成的。

^b 启动是群体实例化(instantiation)和SDFF的混合。

^c 未知的启动。我们要求作者提供原始信息但是并没有收到方法信息的细节。

表 A4 元分析中使用的幸福感研究

使用启动任务和集体主义水平启动组织的研究	大学生样本 (特殊情况如语言除外)	测量	期望的个体主义启动效应	期望的集体主义启动效应	效应值 (<i>d</i>)
欧洲传统					
既有关系集体主义又有群体集体主义					
苏美尔勇士故事					
Gardner et al. (2002, 研究 2)	82 美国人 (英语)	面对自己成绩和群体成绩不匹配的情况的情绪 (McFarland & Beuhler, 1995)	当自己的成绩好时感觉好	当群体成绩好时感觉好	0.35
阈下启动任务(混合关系和群体集体主义)					
Oishi et al. (2000, 研究 3)	40 欧裔美国人 (英语)	当前生活满意度和未来愿景的相关	高	低	0.14
群体集体主义					
群体想象任务(网球比赛单打 vs. 团体赛)					
Lee et al. (2000, 研究 5)	215 美国人(英语)	情绪(PANAS; Watson et al., 1988)	更可能体会到沮丧-振奋类的情绪	更可能体会到激动-宁静类的情绪	-0.68

续表

使用启动任务和集体主义水平启动组织的研究	大学生样本 (特殊情况 如语言除外)	测量	期望的个体主义启动效应	期望的集体主义启动效应	效应值 (<i>d</i>)
语言启动 (假设英语为个体主义启动; 汉语为集体主义启动)					
Ross et al. (2002)	52 在加拿大的中国人 (多数是中国香港人) (29 英语, 23 汉语) ^a	情绪 (PANAS; Watson et al., 1988)	兴奋	沮丧	0.54
亚洲北美传统					
既有关系集体主义又有群体集体主义					
阈下启动任务					
Oishi et al. (2000, 研究 3)	23 亚裔美国人 (英语)	当前生活满意度和未来愿景的相关	高	低	0.06
亚洲传统					
群体集体主义					
群体想象任务 (网球比赛单打 vs. 团体赛)					
Lee et al. (2000, 研究 5)	312 中国香港人 (英语)	情绪 (PANAS; Watson et al., 1988)	更像是沮丧 - 得意情绪	更像是激动 - 平静情绪	-0.15

注: 在发表的文章中被试的资料有详细的描述, 只有国籍是交代了的, 这类信息已经提供 (如美国)。如果样本是根据种族/民族来描述的 (如欧裔美国人), 这类信息也已经提供。

^a 只有中国出生的被试 ($n = 52$) 是语言启动的 (英语 vs. 汉语), 并被包含在语言启动效应的分析中。加拿大数据没有包含在内。

表 A5 元分析中使用的认知研究

使用启动任务和集体主义水平启动组织的研究	大学生样本 (特殊情况 如语言除外)	测量	期望的个体主义启动效应	期望的集体主义启动效应	效应值 (<i>d</i>)
欧洲传统					
关系集体主义					
代词循环任务					
Haberstroh et al. (2002, 研究 1)	34 德国人 (德语)	对会话标准敏感	冗长的问题和反应高相关	冗长的问题和反应低相关	0.7
Haberstroh et al. (2002, 研究 2 预实验)	41 德国人 (德语)	对会话标准敏感	冗长的问题和反应高相关	冗长的问题和反应低相关	0.6
Kühnen & Haberstroh (2004)	213 德国人 (德语)	自我→目标和目标→自我比较的差异	冗长的问题和反应对比高相关; 更加自我参照	同化; 低自我参照	-0.07
Kühnen et al. (2001, 研究 4)	30 美国人 (英语)	在镶嵌图形测验中正确识别图形的数量 (Horn, 1962)	更多 (更多情境独立)	更少 (更少情境独立)	0.97

续表

使用启动任务和集体主义水平启动组织的研究	大学生样本 (特殊情况如语言除外)	测量	期望的个体主义启动效应	期望的集体主义启动效应	效应值 (<i>d</i>)
Kühnen & Oyserman (2002, 研究 1)	30 美国人 (英语)	在识别格式塔整体(由小字母组成的大字母)和部分(小字母)中的反应倾向	迅速部分化加工(情境独立)	迅速格式塔(整体)加工(情境依赖)	0.38
Kühnen & Oyserman (2002, 研究 2)	34 美国人 (英语)	在格子中放置东西的记忆(Chalfonte & Johnson, 1996)	放置任务中的记忆差(更少的情境依赖)	放置任务中记忆好(更多的情境依赖)	0.69
Stapel & Koomen (2001, 研究 1)	60 荷兰人 (荷兰语)	社会比较(自我评价)	对比	同化	0.9
Stapel & Koomen (2001, 研究 5)	144 荷兰人 (荷兰语)	社会比较(自我评价; 感知任务重要性)	对比	同化	1.15
SDFF 任务					
Kühnen et al. (2001, 研究 1)	51 德国人 (德语)	镶嵌图形测验中的反应倾向(Witkin et al., 1971)	快(更加情境独立)	慢(不情境独立)	0.51
Kühnen et al. (2001, 研究 2)	76 德国人 (德语)	在镶嵌图形测验中正确识别出图形的数量(Horn, 1962)	多(更加情境独立)	少(不情境独立)	0.48
Kühnen et al. (2001, 研究 3)	52 德国人 (德语)	智力测验中正确解决了遗漏图形项目的数量(Tewes, 1994)	少(不情境依赖)	多(更加情境依赖)	0.44
Ybarra & Trafimow (1998, 研究 1)	60 美国人 (英语)	关注避孕套使用倾向的决策	关注个人态度	关注标准	0.21
群体想象任务(想象自己 vs. 家庭)					
Aaker & Lee (2001, 研究 1)	92 欧裔美国人 (英语)	说服, 立刻或延迟品牌吸引	更关注提升聚焦信息	更关注抑制聚焦信息	0.49

续表

使用启动任务和集体主义水平启动组织的研究	大学生样本 (特殊情况如语言除外)	测量	期望的个体主义启动效应	期望的集体主义启动效应	效应值 (<i>d</i>)
既有关系集体主义又有群体集体主义					
苏美尔勇士故事					
Gardner et al. (2002, 研究 1)	59 美国人 (英语)	在自我相关任务中预测好朋友的成绩	差(将他人与自己对比)	好(谦虚, 联合自己和他人)	0.79
Ybarra & Trafimow (1998, 研究 2)	48 美国人 (英语)	关注避孕套使用倾向的决策	关注个人态度	关注标准	0.38
Ybarra & Trafimow (1998, 研究 3)	52 美国人 (英语)	关注避孕套使用决策	关注个人态度	关注标准	0.24
以乱序句子为基础的任务: 用特殊词语启动					
Briley & Wyer (2001, 研究 4)	33 美国人 (英语)	妥协选择所占的比重	低	高	-0.13
Kühnen & Hannover (2000)	100 德国人 (德语)	自己与他人相似性感知	低(差异)	高(同化)	-0.00
Lockwood et al. (2004, 研究 2)	64 加拿大人 (英语)	关系相关的自我评价	差	好	0.66
阈下启动, 短文写作任务					
Oishi et al. (2000, 研究 3)	40 欧裔美国人 (英语)	偏好对别人的成功或失败进行归因	(内因)素质的	情境的(外因)	0.43
Stapel & Koomen (2001, 研究 2) ^a	160 荷兰人 (荷兰语)	社会比较(自我感知的相似性)	对比	同化	1.43
群体集体主义					
群体想象任务(网球赛单打 vs. 团体赛)					
Aaker & Lee (2001, 研究 2)	118 欧裔美国人 (英语)	情境回忆	对促进聚焦情境回忆更好	对预防聚焦情境回忆更好	0.42
Aaker & Lee (2001, 研究 3)	177 欧裔美国人 (英语)	对激烈的 vs. 温和的争论的敏感性	对促进聚焦情境更敏感	对预防聚焦情境更敏感	1.08
亚洲北美传统					
既有关系集体主义又有群体集体主义					
阈下启动, 短文写作任务					
Oishi et al. (2000, 研究 3)	23 亚裔美国人 (英语)	偏好对别人的成功或失败进行归因	素质的(内因)	情境的(外因)	0.51

续表					
使用启动任务和集体主义水平启动组织的研究	大学生样本 (特殊情况如语言除外)	测量	期望的个体主义启动效应	期望的集体主义启动效应	效应值 (<i>d</i>)
亚洲传统					
既有关系集体主义又有群体集体主义					
以乱序句子为基础的任务：用特殊词语启动					
Adaval & Cho (2006, 研究 1, 在 Briley & Wyer, 2002 中未发表的数据报告)	116 中国香港人 (英语)	喜欢百事可乐广告	喜欢不同 (鹤立鸡群)	喜欢相同 (不鹤立鸡群)	0.42
Briley & Wyer (2001, 研究 4)	29 中国香港人 (英语)	妥协选择所占的比重	低	高	0.38
群体集体主义					
群体模拟任务 (坐在与别人分开的位置, 以个体为单位计分 vs. 坐在群体中, 给予名字, 以群体为单位计分)					
Briley & Wyer (2002, 研究 2)	43 中国香港人 (英语)	妥协选择 (其中一个, 而不是两个相同的糖果)	不像	更像	0.62
Briley & Wyer (2002, 研究 3)	93 中国香港人 (英语)	妥协选择 (其中一个, 而不是两个相同的糖果)	不像	更像	0.12
Aaker & Lee (2001, 研究 2)	95 中国香港人 (英语)	情境回忆	对促进聚焦情境回忆更好	对预防聚焦情境回忆更好	0.45
Aaker & Lee (2001, 研究 4)	83 中国香港人 (英语)	喜欢有强烈争议的品牌	对促进聚焦情境更喜欢	对预防情境更喜欢	0.57
语言启动 (假设英语为个体主义启动, 汉语为集体主义启动)					
Tavassoli (2002, 研究 3)	41 新加坡人 (21 英语, 20 汉语)	识别出无意义单词的位置	差	好	0.77

注：在发表的文章中被试的资料有详细的描述，只有国籍是交代了的，这类信息已经提供（如美国）。如果样本是根据种族/民族来描述的（如欧裔美国人），这类信息也已经提供。

^a 对被试启动使用的任务是用代词 [代词包括：我（主语），我（宾语），我自己，我的 vs. 我们，我们的，我们自己] 和特定词（唯一，特殊，不平常 vs. 一起，整合，和谐）写一篇短文。

参考文献^①

* Aaker, J. L., & Lee, A. Y. (2001). “I” seek pleasures and “we” avoid pains: The role

① 参考文献前带 “*” 号的为本文元分析所涉及的文献。

- of self-regulatory goals i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persuas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8, 33–49.
- * Adaval, R., & Cho, A. (2006). *Cultural conflicts: How do threats to identity influence persuasion and behavio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Bargh, J. A. (1984). Automatic and controlled processing of social information. In R. S. Wyer, Jr. & T. K. Srull (Eds.), *Handbook of social cognition* (Vol. 1, pp. 1–41). Hillsdale, NJ: Erlbaum.
- Bargh, J. A. (2006). What have we been priming all these years? On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s, and ecology of nonconscious social behavior.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6, 147–168.
- Bargh, J. A., Bond, R. N., Lombardi, W. J., & Tota, M. E. (1986). The additive nature of chronic and temporary sources of construct accessi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0, 869–878.
- Bargh, J. A., & Chartrand, T. L. (2000). The mind in the middle: A practical guide to priming and automaticity research. In H. T. Reis & C. M. Judd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pp. 253–285).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iostat. (2005).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Version 2) [Computer software]. Englewood, NJ: Author.
- Blondel, J., & Inoguchi, T. (2006). Introduction: Political cultures in eighteen countries. In *Political cultures in Asia and Europe: Citizens, states and societal values* (pp. 1–19). New York: Routledge.
- Bond, M. H., & Leung, K. (in press). Cultural mapping of beliefs about the world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a social psychology involving culture: Futurescapes. In C. Y. Chiu, Y. Y. Hong, S. Shavitt, & R. S. Wyer, Jr. (Eds.),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cross-cultural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 * Bond, M. H., & Yang, K. S. (1982). Ethnic affirmation versus crosscultural accommodation: The variable impact of questionnaire language on Chinese bilinguals from Hong Kong.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3, 169–185.
- Bovasso, G. (1997). The interaction of depersonalization and deindividuation. *Journal of Social Distress and the Homeless*, 6, 213–228.
- Brewer, M. B., & Gardner, W. L. (1996). Who is this “we”? Level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self-represent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 83–93.
- * Briley, D. A., & Wyer, R. S. (2001). Transitory determinants of values and decisions: The utility (or nonutility)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in 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Social Cognition*, 19, 197–227.
- * Briley, D. A., & Wyer, R. S. (2002). The effect of group membership salience on the avoidance of negative outcomes: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and consumer decision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9, 400–415.
- Chalfonte, B. L., & Johnson, M. K. (1996). Feature memory and binding in young and

- older adults. *Memory and Cognition*, 24, 403 – 416.
- Chartrand, T. L., & Bargh, J. A. (1996). Automatic activation of impression formation: Nonconscious goal priming reproduces effects of explicit task instruc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 464 – 478.
- Chen, S., Chen, K. Y., & Shaw, L. (2004). Self-verification motives at the collective level of self-defini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6, 77 – 94.
- Chiu, C. Y., Leung, A. K. Y., & Kwan, L. (2007). Language, cognition, and culture: The Whorfian hypothesis and beyond. In S. Kitayama, & D. Cohen (Eds.), *Handbook of cultural psychology* (pp. 668 – 688).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Clayton, S. (2000). Models of justice in the environmental debat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6, 459 – 474.
- Cohen, J. (1988).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2nd ed.). Hillsdale, NJ: Erlbaum.
- Cook, T. D., & Campbell, D. T. (1979). *Quasi-experimentation: Design and analysis issues for field settings*. Boston: Houghton-Mifflin.
- Crisp, R. J., Hewstone, M., Richards, Z., & Paolini, S. (2003). Inclusiveness and crossed categorization: Effects on co-joined category evaluations of in-group and out-group prim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2, 25 – 38.
- de Montes, L., Semin, G., & Valencia, J. (2003). Communication patterns in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22, 259 – 281.
- Duval, S. J., & Tweedie, R. L. (2000a). A non-parametric “trim and fill” method of assessing publication bias in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95, 89 – 98.
- Duval, S. J., & Tweedie, R. L. (2000b). Trim and fill: A simple funnel plot based method of testing and adjusting for publication bias in metaanalysis. *Biometrics*, 56, 276 – 284.
- Finlay, K. A., & Trafimow, D. (199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vate self and helping victims of AID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8, 1798 – 1809.
- Fitzsimons, G. M., & Kay, A. C. (2004). Language and interpersonal cognition: Causal effects of variations in pronoun usage on perceptions of closenes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0, 547 – 557.
- Förster, J., Liberman, N., & Friedman, R. S. (2007). Seven principles of goal activation: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distinguishing goal priming from priming of non-goal construct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1, 211 – 233.
- Gaertner, L., Sedikides, C., & Graetz, K. (1999). In search of selfdefinition: Motivational primacy of the individual self, motivational primacy of the collective self, or contextual prima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6, 5 – 18.
- * Gardner, W. L., Gabriel, S., & Dean, K. K. (2004). The individual as “melting pot”: The flexibility of bicultural self-construals. *Cahiers de Psychologie Cognitive*, 22, 181 – 201.
- * Gardner, W. L., Gabriel, S., & Hochschild, L. (2002). When you and I are “we,”

- you are not threatening: The role of self-expansion in social comparis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2, 239 – 251.
- * Gardner, W. L., Gabriel, S., & Lee, A. Y. (1999). “I” value freedom, but “we” value relationships: Self-construal priming mirrors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judgment.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 321 – 326.
- * Haberstroh, S., Oyserman, D., Schwarz, N., Kühnen, U., & Ji, L. J. (2002). Is the interdependent self more sensitive to question context than the independent self? Self-construal and the observation of conversational norm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8, 323 – 329.
- Hedges, L., & Olkin, I. (1985).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meta-analysis*.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 Higgins, E. T. (1989). Knowledge accessibility and activation: Subjectivity and suffering from unconscious sources. In J. S. Uleman & J. A. Bargh (Eds.), *Unintended thought* (pp. 75 – 123).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Higgins, E. T. (1996). Knowledge activation: Accessibility, applicability, and salience. In E. T. Higgins & A. W. Kruglanski (Eds.), *Social psychology: 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 (pp. 133 – 168).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Higgins, E. T. & Bargh, J. A. (1987). Social cognition and social percep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8, 379 – 426.
- Higgins, E. T., Rholes, W. S., & Jones, C. R. (1977). Category accessibility and impression form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3, 141 – 154.
- Ho, D. Y. F. (1977). Culture-specific belief stereotyping and some of its personality, attitudinal, and intellectual correlates. In Y. H. Poortinga (Ed.), *Basic problems i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pp. 289 – 298). Lisse, the Netherlands: Swets & Zeitlinger.
- Hofstede, G. (1980). *Culture's consequenc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Hofstede, G. (2001).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 Holland, R. W., Roeder, U. R., van Baaren, R. B., Brandt, A. C., & Hannover, B. (2004). Don't stand so close to me: The effects of selfconstrual on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 237 – 242.
- Horn, W. (1962). *Leistungsprüfsystem, L-P-S: Handanweisung für die Durchführung, Auswertung und Interpretation* [A performance testing system: Manual for administration, scoring, and interpretation]. Göttingen, Germany: Hogrefe-Verlag.
- Inglehart, R. (1990).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nglehart, R.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nglehart, R. (2000, Winter). Globalization and postmodern value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3 (1), 215 – 228.
- Inglehart, R., & Baker, W. (2000).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 19 – 51.

- Inglehart, R., & Oyserman, D. (2004). Individualism, autonomy, and self-expression: The human development syndrome. In H. Vinken, J. Soeters, & P. Ester (Eds.), *Comparing cultures: Dimensions of culture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74 – 96).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rill.
- James, W. (1890).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Holt.
- Jensen, A., & Whang, P. (1994). Speed of accessing mathematical facts from long-term memory: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Anglo American children.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 1 – 13.
- Johnson, B. T. (1993). *DSTAT. 10 : Software for the meta-analytic review of research literatures*. Hillsdale, NJ: Erlbaum.
- Johnson, B. T., & Eagly, A. H. (2000). Quantitative synthesis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H. T. Reis & C. M. Judd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pp. 496 – 528).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ağıtçıbaşı, Ç. (1997). Whither multiculturalism?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46 (1), 44 – 49.
- Kanagawa, C., Cross, S. E., & Markus, H. R. (2001). “Who am I?”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the conceptual sel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7, 90 – 103.
- Kashima, Y., Kashima, E. S., & Aldridge, J. (2001). Toward cultural dynamics of self-conceptions. In C. Sedikides & M. B. Brewer (Eds.), *Individual self, relational self, collective self* (pp. 277 – 298). Philadelphia: Taylor & Francis.
- Kelley, H. H. (1955). Salience of membership and resistance to change of group-anchored attitudes. *Human Relations*, 8, 275 – 289.
- * Kimmelmeier, M. (2003). Individualism and attitudes toward affirmative action: Evidence from priming experiments.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5, 111 – 119.
- * Kimmelmeier, M., & Cheng, B. (2004). Language and self-construal priming: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in a Hong Kong sampl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5, 705 – 712.
- * Kimmelmeier, M., Wiczorkowska, G., Erb, H. P., & Burstein, E. (2002). Individualism, authoritarianism, and attitudes toward assisted death: Cross-cultural, cross-regional,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2, 60 – 85.
- Kitayama, S., Duffy, S., Kawamura, T., & Larsen, J. (2003). Perceiving an object and its context in different cultur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 201 – 206.
- Kitayama, S., Duffy, S., & Uchida, Y. (2007). Self as cultural mode of being. In S. Kitayama & D. Cohen (Eds.), *Handbook of cultural psychology* (pp. 136 – 174).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Kuhn, M. H., & McPartland, T. S. (1954).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self-attitud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 68 – 76.
- * Kühnen, U., & Haberstroh, S. (2004). Self-construal activation and focus of comparison as determinants of assimilation and contrast in social comparisons. *Cahiers de Psychologie Cognitive*, 22, 289 – 310.

- * Kühnen, U., & Hannover, B. (2000). Assimilation and contrast in social comparisons as a consequence of self-construal activ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0, 799 – 811.
- * Kühnen, U., Hannover, B., & Schubert, B. (2001). The semantic procedural interface model of the self: The role of self-knowledge for context-dependent versus context-independent modes of think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0, 397 – 409.
- * Kühnen, U., & Oyserman, D. (2002). Thinking about the self influences thinking in general: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salient self-concep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8, 492 – 499.
- * Lee, A. Y., Aaker, J. L., & Gardner, W. L. (2000). The pleasures and pains of distinct self-construals: The role of interdependence in regulatory focu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 1122 – 1134.
- Leung, T., & Kim, M. S. (1997). *A revised self-construal scal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onoa.
- * Levine, T. R., Bresnahan, M. J., Park, H. S., Lapinski, M., Wittenbaum, G., Shearman, S., et al. (2003). Self-construal scales lack validity.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9, 210 – 252.
- Lipsey, M. W., & Wilson, D. B. (2001). *Practical meta-analysi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Liu, I. M. (1986). Chinese cognition. In M. H. Bond (Ed.), *The psychology of the Chinese people* (pp. 73 – 10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Lockwood, P., Dolderman, D., Sadler, P., & Gerchak, E. (2004). Feeling better about doing worse: Social comparisons with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 80 – 95.
- Maass, A., Karasawa, M., Politi, F., & Suga, S. (2006). Do verbs and adjectives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different cultures? A cross-linguistic analysis of person represent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0, 734 – 750.
- * Mandel, N. (2003). Shifting selves and decision making: The effects of self-construal priming on consumer risk-taking.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0, 30 – 40.
- * Marian, V., & Kaushanskaya, M. (2004). Self-construal and emotion in bicultural bilinguals.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51, 190 – 201.
-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 224 – 253.
- Matsumoto, D. (2002). *The new Japan: Debunking seven cultural stereotypes*. Yarmouth, ME: Intercultural Press.
- McFarland, C., & Beuhler, R. (1995). Collective self-esteem as a moderator of the frog-pond effect in relation to performance feedback.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8, 1055 – 1070.
- Miller, J. G., Bersoff, D. M., & Harwood, R. L. (1990). Perceptions of social responsi-

- bilities in India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Moral imperatives or personal decis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 33 – 47.
- Mussweiler, T. , & Bodenhausen, G. V. (2002) . I know you are , but what am I? Self-evaluative consequences of judging in-group and out-group memb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2, 19 – 31.
- Neely, J. H. (1977) . Semantic priming and retrieval from lexical memory: Roles of inhibitionless spreading activation and limited-capacity atten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06, 226 – 254.
- Nisbett, R. E. (2003) .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 and why*. New York: Free Press.
- Nisbett, R. E. , & Cohen, D. (1996) . *Culture of honor: The psychology of violence in the South*.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Norenzayan, A. , Choi, I. , & Peng, K. (2007) .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In S. Kitayama & D. Cohen (Eds.) , *Handbook of cultural psychology* (pp. 569 – 594) .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 Oishi, S. , Wyer, R. , & Colcombe, S. (2000) . Cultural variation in the use of current life satisfaction to predict the fut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 434 – 445.
- Oyserman, D. (2006) . High power, low power, and equality: Culture beyond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16, 352 – 356.
- Oyserman, D. , Coon, H. , & Kimmelmeier, M. (2002) . Rethink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Evaluation of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meta-analys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 3 – 72.
- Oyserman, D. , Kimmelmeier, M. , & Coon, H. (2002) . Cultural psychology, a new look: Reply to Bond (2002) , Fiske (2002) , Kitayama (2002) , and Miller (2002) .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 110 – 117.
- Oyserman, D. , & Lee, S. W. S. (2007) . Priming “culture”: Culture as situated cognition. In S. Kitayama & D. Cohen (Eds.) , *Handbook of cultural psychology* (pp. 255 – 279) .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Oyserman, D. , & Lee, S. W. S. (in press) . A situated cognition perspective on culture: Effects of priming cultural syndromes on cognition and motivation. In R. Sorrentino & S. Yamaguchi (Eds.) , *Handbook of motivation and cognition across cultures*. New York: Elsevier.
- Oyserman, D. , Sorensen, N. , Reber, R. , Sannum, P. , & Chen, S. (2008) . *What did you say? What did you say? “I” pay attention to one thing “We” listen to everything*.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 * Ralston, D. A. , Cunniff, M. K. , & Gustafson, D. J. (1995) . Cultural accommodation: The effect of language on the responses of bilingual Hong Kong Chinese manager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6, 714 – 727.
- Reed, A. (2004) . Activating the self-importance of consumer selves: Exploring identity salience effects on judgment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1, 286 – 295.

- Rokeach, M. (1973). *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s*. New York: Free Press.
- Rosenberg, M. (1965).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senthal, R. (1979). The file drawer problem and tolerance for null result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6, 638–641.
- Rosenthal, R. (1995). Writing meta-analytic review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8, 183–192.
- * Ross, M., Xun, W. Q. E., & Wilson, A. E. (2002). Language and the bicultural sel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8, 1040–1050.
- Schwartz, S. H. (1990).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Critique and proposed refinement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1, 139–157.
- Schwartz, S. H. (1992). 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 In M. P. Zanna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25, pp. 1–6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chwartz, S. H., & Bilsky, W. (1987). Toward a universal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human valu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3, 550–562.
- Schwarz, N. (2000). Social judgment and attitudes: Warmer, more social, and less consciou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0, 149–176.
- Schwarz, N. (2002). Situated cognition and the wisdom of feelings: Cognitive tuning. In L. F. Barrett & P. Salovey (Eds.), *The wisdom in feelings: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i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pp. 144–166).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Schwarz, N. (2006). Attitude research: Between Ockham's Razor and the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33, 19–21.
- Schwarz, N., & Brand, J. F. (1983). Effects of salience of rape on sex role attitudes, trust, and self-esteem in non-raped wome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 71–76.
- Schwarz, N., & Strack, F. (1981). Manipulating salience: Causal assessment in natural setting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7, 554–558.
- Semin, G. (2000). Agenda 2000—Communication: Language as an implementational device for cogni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9, 484–501.
- Semin, G., Grts, C., Nandram, S., & Semin-Goossens, A. (2002).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the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 of emotion and emotion events. *Cognition and Emotion*, 16, 11–28.
- Shavitt, S., Lalwani, A. K., Zhang, J., & Torelli, C. J. (2006). The horizontal/vertical distinction in cross-cultural consumer research.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16, 325–342.
- Singelis, T. M. (1994). The measurement of independent and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 580–591.
- Srull, T. K., & Wyer, R. S. (1978). Category accessibility and social percep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 841–856.

- Strull, T. K. , & Wyer, R. S. (1979) . The role of category accessibilit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persons: Some determinants and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37 , 1660 – 1672.
- * Stapel, D. A. , & Koomen, W. (2001) . I, we, and the effects of others on me: How self-construal level moderates social comparison effec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80 , 766 – 781.
- Stapel, D. , & Semin, G. (2007) . The magic spell of language: Linguistic categories and their perceptual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93 , 23 – 33.
- Stapel, D. A. , & Tesser, A. (2001) . Self-activation increases social comparis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81 , 742 – 750.
- Sutton, A. J. , Song, F. , Gilbody, S. M. , & Abrams, K. R. (2000) . Modeling publication bias in meta-analysis: A review. *Statistical Methods in Medical Research* , 9 , 421 – 445.
- Tajfel, H. (1982) .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 33 , 1 – 39.
- Tajfel, H. (2001) . Social stereotypes and social groups. In M. A. Hogg & D. Abrams (Eds.) , *Intergroup relations: Essential readings* (pp. 132 – 145) .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 Tajfel, H. , & Forgas, J. (2000) . Social categorization: Cognitions, values and groups. In C. Stangor (Ed.) , *Stereotypes and prejudice: Essential readings* (pp. 49 – 63) .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 Tajfel, H. , & Turner, J. C. (2004) .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J. Jost & J. Sidanius (Eds.) , *Political psychology: Key readings* (pp. 276 – 293) .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 * Tavassoli, N. T. (2002) . Spatial memory for Chinese and English.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 33 , 415 – 431.
- Taylor, S. E. (1998) . The social being in social psychology. In D. Gilbert, S. Fiske, & G. Lindzey (Eds.) ,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4th ed. , Vol. 1 , pp. 58 – 95) . New York: McGraw-Hill.
- Taylor, S. E. , & Fiske, S. T. (1978) . Salience, attention, and attribution: Top of the head phenomena.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 11 , 249 – 288.
- Tewes, U. (1994) . *HAWIE-R: Hamburg-Wechsler-Intelligenztest für Erwachsene, Revision 1991: Handbuch und Testanweisung* [HAWIE-R: Hamburg-Wechsler Intelligence Test for Adults, Revision 1991 : Test manual] (2nd ed.) . Bern, Switzerland: Huber.
- * Trafimow, D. , Silverman, E. S. , Fan, R. M. T. , & Law, J. S. F. (1997) . The effects of language and priming on the relative accessibility of the private self and the collective self.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 28 , 107 – 123.
- * Trafimow, D. , & Smith, M. D. (1998) . An extension of the “two-baskets” theory to Native American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 28 , 1015 – 1019.
- * Trafimow, D. , Triandis, H. , & Goto, S. (1991) . Some tests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rivate self and the collective self.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60 ,

649 – 655.

- Triandis, H. C. (1988). Collectivism vs. individualism: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a basic concept in cross-cultural social psychology. In G. K. Verma & C. Bagley (Eds.), *Cross-cultural studies of personality, attitudes and cognition* (pp. 60 – 95).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 Triandis, H. C. (1989). Cross-cultural studie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In R. A. Dienstbier & J. J. Berman (Eds.),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Vol. 37.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pp. 41 – 133).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Triandis, H. C. (1995).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Triandis, H. C. (1996). The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of cultural syndrom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1, 407 – 415.
- Triandis, H. C. (2007). Culture and psychology: A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their relationship. In S. Kitayama & D. Cohen (Eds.), *Handbook of cultural psychology* (pp. 59 – 76).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Triandis, H. C., & Gelfand, M. J. (1998). Converging measurement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118 – 128.
- Triandis, H. C., McCusker, C., & Hui, C. H. (1990). Multimethod probe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9, 1006 – 1020.
- Triandis, H. C., & Trafimow, D. (2001). Cross-national prevalence of collectivism. In C. Sedikides & M. B. Brewer (Eds.), *Individual self, relational self, collective self* (pp. 259 – 276). Philadelphia: Taylor & Francis.
- * Utz, S. (2004a). Self-activation is a two-edged sword: The effects of I primes on cooper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0, 769 – 776.
- * Utz, S. (2004b). Self-construal and cooperation: Is the interdependent self more cooperative than the independent self? *Self and Identity*, 3, 177 – 190.
- * van Baaren, R. B., Maddux, W. W., Chartrand, T. L., de Bouter, C., & van Knippenberg, A. (2003). It takes two to mimic: Behavioral consequences of self-construal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 1093 – 1102.
- * Vohs, K. D., & Heatherton, T. F. (2001). Self-esteem and threats to self: Implications for self-construals and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 1103 – 1118.
- Vorauer, J., & Cameron, J. (2002). So close, and yet so far: Does collectivism foster transparency overestim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 1344 – 1352.
- Wang, Q., & Ross, M. (2007). Culture and memory. In S. Kitayama & D. Cohen (Eds.), *Handbook of cultural psychology* (pp. 645 – 667).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 Watkins, D., & Gerong, A. (1999). Language of response and the spontaneous self-concept: A test of the cultural accommodation hypothesi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0, 115 – 121.
- * Watkins, D., & Regmi, M. (2002). Does the language of response influence self-presentation? A Nepalese test of the cultural accommodation hypothesis. *Psychologia: An Inter-*

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 the Orient , 45 , 98 – 103.

Watson , D. , Clark , L. A. , & Tellegen , A. (1988) .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54 , 1063 – 1070.

* Wenzel , M. (2002) . What is social about justice? Inclusive identity and group values as the basis of the justice motiv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 38 , 205 – 218.

Wit , A. P. , & Kerr , N. L. (2002) . “Me versus just us versus us all” categoriz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nested social dilemma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83 , 616 – 637.

Witkin , H. A. , Oltman , P. K. , Raskin , E. , & Karp , S. A. (1971) . *Manual for the Embedded Figures Test , Children’s Embedded Figures Test , and Group Embedded Figures Test*. Palo Alto , CA: 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

* Yang , K. S. , & Bond , M. H. (1980) . Ethnic affirmation by Chinese bilingual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 11 , 411 – 425.

* Ybarra , O. , & Trafimow , D. (1998) . How priming the private self or collective self affects the relative weights of attitudes and subjective norm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 24 , 362 – 370.

译者简介

赵玉芳: 博士, 教授, 硕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危机干预工作委员会委员, 重庆市心理学会理事、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教育经历: 1993—1997 年,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心理学专业, 获学士学位; 1997—2000 年, 西南师范大学心理系基础心理学专业, 获硕士学位; 2001—2005 年, 西南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 获博士学位。

2000 年至今, 在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工作。主要从事社会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教学工作。所讲授的课程包括: 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进展、社会认知研究进展、教育心理学、心理教育能力训练等。研究兴趣: 社会认知与健康, 包括群际认知与行为、社会比较、心理健康等。